

《讨伐中宣部》

焦國標（1963年11月21日－），北京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新聞學研究者、作家和異見學者。2004年3月發表《討伐中宣部》一文，指責中宣部實行愚民政策，主張新聞自由。該文最初發表在《開放》雜誌上，後來被互聯網上廣泛轉載。2012年9月12號，焦被警方從家中帶走，後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事拘留，但未見後續審訊新聞。

目录

讨伐中宣部.....	2
《环球时报》专捧老年独裁者.....	26
中国大陆信息猪圈共有几块顽石砌成.....	39
中国开放报禁的三种途径.....	62
美国归来答客难.....	67
自由出版物的四项出版原则.....	78

讨伐中宣部

焦国标

编者按：此文写於2003年12月至2004年3月，最初出现在电脑网络上，而後迅速在中国境外各种媒体上传播开来，至2004年8月，已被翻译成至少22种语言，英文译本也有多个。作者因此遭受当局停止上课、停止指导研究生的处罚。

当下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瓶颈是什么？是中宣部。

当下中国文明发展的绊脚石是什么？是中宣部。

当下中国为邪恶势力和腐败分子撑起最大、最有力的保护伞者是谁？是中宣部。

何以言之？

谁都知道新闻自由是一个社会最好的防腐剂，是确保一个透明度的基本前提，谁都知道中国不是新闻自由太多，而是新闻自由太少，试问是谁把本已少得可怜的新闻自由，又来个缺斤短两、横挑竖扣，从而致使中国社会贿赂公行，邪恶势力猖獗？是中宣部。新闻自由度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度，西方先哲说，可以没有政府，不可以没有新闻自由。中宣部以新闻自由为敌，连新闻自由四字都不许随意使用，这分明是对最起码文明准则的公然践踏。触目惊心、俯拾即是的事实证明，中宣部已经堕落为当下中国最愚昧、最落后势力的堡垒，在他们弄权得到快乐和贿赂的同时，党和政府的形象、国家的文明进步因此

都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果听任其横行不法、擅权祸国下去，不仅它自身将沉沦到阿鼻地狱万劫不复，便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大业也将被大打折扣，中国的政治文明进程将被大大延迟，我中国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的颜面亦将扫地以尽。因而我们欲挽中国於将亡，必奋不顾身，起而讨伐中宣部。

一、中宣部害了十四种大病

中宣部害的第一大病是工作方式巫婆神汉化。许多人都看过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现在中宣部的工作方式堪比小二黑他爹二诸葛和小琴他妈三仙姑。在这两位大神眼里，今天“不宜栽种”，明天“不宜出行”，后天不宜娶媳妇，大后天不宜嫁闺女。人家都收获了，他刘自得还“不宜栽种”着呢；人家都抱孙子了，他刘自得还念着“不宜嫁娶”呢。中宣部整治新闻媒体不正与此德行类同吗？今天不许再提蒋彦永，明天不得反思非典，后天又有新禁忌，不得说媒体是“社会公器”，诸如此类。试问中宣部这些禁令都是怎么得来的？依据是什么？比二诸葛和三仙姑的“结论”科学多少？他们的“不许”，毫无根据，绝对想当然，绝对人治，绝对与人类基本文明准则背道而驰，与巫婆神汉违背基本科学常识属于同一个级别。中宣部总说新闻媒体“不要添乱”，殊不知我们现在的乱是人家英国几百年前都添过了的。现在这乱再不添，这问题再不解决，中国就完了。

中宣部害的第二大病是权威程度罗马教会化。如今中宣部实在太正确了，正确得跟欧洲中世纪的罗马教会一样，势焰熏天，莫予毒也，

炙手可热，谁碰到它都要被它烧糊半截，就跟柳宗元笔下永州之野产的那种异蛇一样，触草木，草木尽死，咬了人，没治。我们不能听任中宣部正确得像中世纪的罗马教会，我们不能听任中宣部部长神圣得像红衣大主教，我们不能听任中宣部厉害得像永州牌异蛇。新闻媒体监督这个监督那个，谁敢监督中宣部和各级宣传部？“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宣传部门处分了那么多的记者、老总，没谁敢吱声，难道宣传部永远正确吗？现在政府各部，无论依法行事的程度如何，总还有个法，可是中宣部发号施令根本没有章法，混同於巫婆神汉顺口胡扯，悖逆最起码的人类政治文明，而其效力却是金口玉牙！中宣部是目前中国惟一不依法行政的死角，是法律的太阳照射不到的惟一的黑暗王国。中宣部是人民共和国领土上最後一只黑箱，我们不能答应它继续平安而威力四射地存在。罗马教会贻误欧洲一千年，我们难道能听任中宣部也贻误中国一千年吗？

中宣部害的第三大病是日本文部省化。日本文部省屡屡修改学校教材，篡改侵华历史，把“侵入”改成“进入”。中宣部有过之而无不及，凡历史上的罪错皆不许提，反右、文革、饿死几千万农民、六四、哈尔滨的宝马案等等，皆成禁忌字眼。这一切已经令所有媒介和学术中人忍无可忍，令普通民衆伤心欲绝。

中宣部害的第四大病是宪法杀手。言论出版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的权利，按道理说，中宣部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宣传部，它就应该是言论出版自由的捍卫者，而实际上它却是宪法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最大侵害者，整个一个精神屠夫。自己制定

的宪法，自己的党政职能部门不去努力保障它，却是千方百计地折扣它、践踏它，这在当今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扞卫宪法，就不能不讨伐中宣部。

中宣部害的第五大病是背叛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已於实际行动上堕落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向国民党专制统治抗争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光彩夺目的时期。有人将此期的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和一般言论文章择要辑为《历史的先声》一书出版，竟遭中宣部查禁。这些文章言必称民主，言必称言论自由，是当时中国最伟大、最能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文章，而今居然遭到中宣部的查禁，足见中宣部已经如何深重地沉沦为共产党原初理想的敌人。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应该鸣鼓而攻之，决不可坐视中宣部再如此随心所欲地乱党祸国下去。

中宣部害的第六大病是冷战思维的衣钵传人。中宣部向媒体吹风，凡涉美国，必是敌意。“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至今仍然是中宣部对外宣传和事关欧美新闻报道的指南。某出版社编辑报一个选题是《看美国人怎样治国》，总编辑一看题目，急了，问：“你什么意思？”总编辑这话的意思是，美国人的政治文明是不可赞美的。中宣部训话会一贯讲究的就是这样的导向。美国的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当你把它诬为臭狗屎的时候，实际上你已嗅着向真正的臭狗屎靠近或正在进食。心地光明磊落一些吧，中宣部！恢复正常的嗅觉，把狗屎称为狗屎，把香饽饽称为香饽饽才是我们中国的出路所在。否则自己必然身败名裂，必

将把自己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实际上中宣部已经声名狼藉太久，赶快悬崖勒马。

中宣部害的第七大病是中央精神的克扣者、阻挠者，而不是贯彻者。媒介中人，特别是那些常到中宣部“领旨”听训的媒体领导人称：你听中央领导讲话，中国一片光明，大有希望，可是你一到中宣部听训，中国简直是乌云翻滚、魔爪横伸，整个感觉中央精神的头号阳奉阴违者、头号克扣者、头号反对者、头号否定者和头号干扰阻挠者，不是台湾，不是香港，不是贪官污吏，不是海外民运分子，不是美帝国主义，不是法轮功，不是六四死难家属，而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中央宣传部。此时你禁不住产生今夕何夕的感觉，中宣部究竟是谁的中宣部，它究竟是听谁的，今日域中，究竟是光明的天下，还是黑暗的天下。笔者写此文，正值2004年两会期间，这本应是媒体最活跃，中国人政治生活最自由的时期，可是你看媒体被中宣部收拾得，个个“清心寡欲”，家家都成“素食者”，会上谈的一些重大问题，修宪、拆迁之类，都不许媒体自由言说，实在是给中央的中心工作对着干。

中宣部害的第八大病是冷血弱智病。日前与某杂志社一位朋友通电话，无意间谈到他们最近一期杂志刊载的一组关于信访的文章。恰好我也看了这篇文章，他说：“这组文章影响不小，中宣部都打来电话了，说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信访问题最大的一篇报道。”我立即回应道：“远远不够！应该做一期专号。你们这一期做的是啥呀？简直就是一趟浮光掠影的信访旅游，把信访者的苦难当风景看，隔靴搔痒，太轻飘飘了。应该照着督促和帮助政府彻底解决信访问题的方向去做，

脚踏实地而不是浮光掠影，追根溯源，竭尽媒介之力，坚决挖掉导致信访现象产生和存在的各级毒瘤。前不久在网上我发表一篇《给温总理的一封信》，提请并奉劝他们这一届政府，要拿三分之一的精力，解决人民群众幸福感指数过低的问题。富裕固然重要，可是富裕而不幸福，人文环境不适合人类居住，有背政府初衷，是国家的硬伤。上访就是这样一块硬伤，是老百姓幸福感的头号杀手。我相信温总理能够看到那封信。信访的存在是我们不可饶恕的罪恶，居然听任它存在几十年，实在太罪过！良心大大地坏了！”

听我此番话，这位朋友接着说：“中宣部的电话不是来鼓励的，而是来责备的。说这样报道会影响社会稳定。”我心中顿时无名火起：“这种混蛋！简直是弱智！上访者个个都是炸弹又能怎样？对于十三亿中国人民来说，毕竟是极少数，怎么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何况上访者十之八九都是蔫人，真正的暴烈之士根本不会去上访。长期听任上访的存在才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头号原因，宣传部的此类责备又是导致上访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源。如果媒体自由跟进，而不是像这样被各级宣传部的冷血和愚昧封锁着，上访现象早他妈八百年就绝迹了！”

形诸文字还客气了一些的，在电话里我跟泼妇和泼皮一样破口大骂，没有一点风度和修养。我简直是出离愤怒了！报道上访怎么会影响社会稳定？不报道才会积累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面对一个个悲惨的上访故事，你们居然能无动於衷，居然责备媒体报道太过，实在是太铁石心肠！太愚昧，太冷血，太可恨了！这样的心智，这样的冷血，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发号施令，怎么能不误我苍生，误我中华！

非典期间，在卫生部举行的那次究竟该如何公开非典疫情真相的研讨会上，有卫生部的官员担心和盘托出真相会引起恐慌，我当即怒不可遏：“在座的不是都知道真相了吗？大家不都好好的没有一个寻死上吊投井跳楼吗？别以为我们比老百姓高明多少！现在就可以通知媒体，召开新闻发布会，立即向国人公开疫情真相。”卫生部领导真是“从善如流”，第二天果然公开了疫情，就是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张文康部长公开的来中国旅游很安全那个“真相”。我插这个曲是什么意思？是想说明，有些政府官员要比普通人懒惰得多，冷血得多，也愚昧得多。他们大脑根本没有科学缜密思维的影子，完全是跟着愚昧的感觉走，跟着愚昧的想当然下结论、做决策、下命令。口口声声为社会效益计，为国家稳定计，本质上是“误国误民，实乃千秋罪人！”

中宣部害的第九大病是庇护恶棍和腐败分子。年前各新闻媒体都传达了中宣部吹胡子瞪眼睛转达的二十五个“不准”，其中一个“不准”是不准各家新闻媒体报道云南省委宣传部长被“双规”的消息。为什么不准报道？说是这影响宣传系统的形象。这个理由太邪恶！宣传部没有免於被监督的特权。不许报道云南省委宣传部长被“双规”，试问你代表了谁的利益？你代表了“双规分子”的利益！这一“不准”，让新闻记者扼腕痛惜，让腐败分子暗暗称快，这不是一个以宣传“三个代表”为业的机构可以说出口的话。真正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请问一切正义之士：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宣部封杀无数新闻报道，每一个报道里都是小民被欺；封杀一个报道就是纵容继续欺压小民，做恶人的帮凶。

中宣部害的第十大病是吃里扒外。新闻媒体被中宣部管得跟三孙子一样灰头土脸。你管他就应该保护它，可是记者屡屡被打，从来没见过中宣部站出来为记者说话，给记者撑腰。修理记者的办法一套一套，层出不穷，可到记者需要你为他们鸣冤撑腰讨公道的时候，你乌龟王八脖子一缩，生死由他去，屁都不放一个！

中宣部害的第十一大病是表面上的精神贵族，实际上的金钱奴隶，铜臭十足，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们对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随意叫“停”，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稳定压倒一切”，许多时候实际是权钱交易，是权力寻租，是受恶人之托、忠恶人之事，拿党和国家赋予的媒介管理权为腐败分子减祸消灾，谋取私利。据一些大型网站和著名报刊的从业者介绍，中宣部一些人常以宣传为名，指令媒体免费给一些文化商品做广告。媒体该收的广告费免去了，可是广告主的广告费没有免，哪去了？进了中宣部官员的腰包。另据可靠消息，宁波普陀区曾拿八十万元，请中宣部摆平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天津一个卫生事件的当事人，也曾拿出几十万元贿赂中宣部，求中宣部封杀中央电视台的报道。看起来是封杀一个报道，实际上就是庇护一群或一个恶棍，是延续一个灾难，是出卖党和政府的形象以换取非法利益。最近，中宣部下令封死宝马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有没有接受事主的黑钱？我们不能不提出质疑。

中宣部害的第十二大病是嫉妒贤德，谁冒头就封杀谁，谁的正义感突出就“活埋”谁。现在中国不能有畅销书，哪本书畅销接着必有中

宣部跑步“灭火”。理由冠冕堂皇，内心阴暗无比。封杀一本有创意的走红新书，就是扼杀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摁下去一个有正义感的记者或学者或报纸，就是摧灭中国社会的正气。最近《中国农民调查》被封，是最典型的个案。当下中国社会，之所以精神创造力枯萎，道德沦丧，正义泯灭，邪恶势力猖獗，正气如游丝，中宣部要负百分之九十九的罪责。中宣部败坏了中国的政治道德和社会道德，中宣部是意识形态恐怖主义的制造者，是中国社会精神世界的“基地”组织。

中宣部害的第十三大病是中国弱势群体灾难的二级制造者。民工欠薪多年，为什么直到温总理时代才真正着手解决？宣传部一向不许媒体报道，欠薪问题进入不了国人的视野，怎么可能解决？上访为什么几十年不绝，有的祖孙几代上访，前仆后继，为什么？因为有宣传部为无数的罪恶捂着盖子。计划生育有多少惨绝人寰的事，都因为得不到媒体的报道而屡屡重演。恶人不怕见官，就怕见报，新闻媒体本来可以为中国人民做一万件好事，解决一万件灾难，只因宣传部愚昧落后的思维方式和霸道武断的工作作风，却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件被勒令禁绝。宣传部系统整个就是中国弱势群体灾难的延续者、加码者和二级制造者。

中宣部害的第十四大病是媒体老总们的是非感、正义感、文明感的戕杀者。每次听中宣部训话归来，受训的媒体领导都大倒苦水，说坐在中宣部的会议室里简直是时光倒流，中宣部的那套说辞实在太违背时代潮流。看上去他们好胳膊好腿去，好胳膊好腿回，没有半点损伤，实际他们内心被大大挫伤，他们的是非感、正义感和文明感被中

宣部的训话彻底地损伤了。是非感的伤害是世间最大的伤害，正义感的被蹂躏是最残暴的蹂躏。

二、上下策拯救中宣部

上策，撤消各级宣传部。美国有中宣部吗？英国是吗？欧洲有吗？都没有。谁有中宣部？纳粹德国有中宣部，而且曾涌现出一位著名的部长，就是戈培尔博士，“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这条谎言的发明者。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有中宣部，当时的中心工作是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宣传朱毛的队伍是“共匪”。宣传部本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它的核心工作是好事无中生有，坏事有中生无；好事小的化大，坏事大的化小；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不知客观为何物，与实事求是的精神背道而驰。**宣传部这种工作本身就是罪恶，就是灾难，就是政党和政府自绝於人民之举。**中国政府如果说在国际社会上形象不理想，应该首追中宣部的责任，它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方式都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下策，制定一部《宣传部工作法》，允许其依照现有工作模式运行，但是必须设置监督环节，一切照章法来，以节制宣传部的工作，不得再采用三仙姑式的巫婆神汉工作法，不得再正确得如同罗马教会。具体办法如下：

办法一，设立专门的学术研究项目，为中宣部的功罪盘点，看看宣传部系统在过去的历史时期里都立过哪些功，犯过那些罪，哪些宣

传部长是中华民族의功臣，哪些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功臣画进凌烟阁，罪人刻上耻辱柱。可以倒着清盘，从现任刘云山、吉炳轩开始，依次丁关根、王忍之、徐惟诚等，顺着往上捋。

办法二，建立中宣部工作日志。中宣部和各级宣传部，必须有清楚全面的工作日志，今天下了哪些封杀令，明天举了哪些黄牌，必须笔笔记录在案，昭昭在册，以备查询，以备监督，以备日後责任追究，以备日後历史的论功和定罪。眼下正流行的那种企图逃避责任追究和历史审查，以电话下禁令，不留文字声音痕迹的鬼魅做法必须坚决禁止。一件坏事，新闻媒体正准备暴光，宣传部的电话便斜刺杀来，高喊“刀下留人，不许报道！”研究者对此类情况一定要格外注意，除了冠冕堂皇的“稳定压倒一切”之外，还要细心考察这背後还有没有权钱交易？要追问凭什么你自告奋勇替坏人坏事捂盖消灾？鲁迅先生说：“我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我们有理由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宣传部的这种“叫停”电话。一个“叫停”电话，拿坏人多少贿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给我从实招来！

办法三，建立宣传部工作事故追惩制度。豆腐渣工程有责任追究制度，宣传部工作如果发生失误，其危害比豆腐渣工程更大，故也应该有事故追究制度。一句话，意识形态的超级豆腐渣工程危害更大，不能白白放过。当年中宣部发动的许多反这反那的活动，现在看都是笑谈甚至是不可理喻的倒行逆施，为什么不见有人为那些丑事、蠢事负责？

办法四，增加中宣部工作透明度，媒体随时将中宣部下达的各种“不许”指令刊登在报刊上，或者发布上网。中宣部也有这样做的法定义务，让全国人民都来评价宣传部下达的这些禁令哪些属于正确的，是功德；哪些是罪恶，是反文明，是伤天害理。各媒体老总，听了中宣部的训话之后，凡觉得有违背文明社会基本常识的指令，都应该自觉将其发布上网。定期到中宣部“领旨”的媒体老总们，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文明计，造中宣部的反，你们应该当仁不让。丑恶言行最惧怕透明，中宣部的跋扈和“常有理”也是被媒体老总们听完不正确、甚至反动的训话之后“秘而不宣”惯出来的。据一些老总讲，中宣部训话根本不讲理性，不循文明常识，也不讲什么媒体责任，有时甚至迹近流氓无赖滚刀肉的腔调，充溢在训话中的是酣畅淋漓的颢预气和管人欲。中国新闻媒介体系如此庞大，而对中国社会进步和中国人民的福祉贡献实在太少，祸根就是整个宣传部系统使出全幅力量，专以拖新闻监督的後退，拉历史的倒车为职责。实在令人痛心！实在令人愤怒！

办法五，中纪委要盯紧中宣部的每一件“叫停”。这些“叫停”的十之八九都是拿了恶人的钱。封杀新闻报道的受贿要比一般受贿更加罪孽深重，每一项封杀令必然有人蒙受覆盆之冤。我把受贿的罪孽分三等，最轻的是一般行政官员的受贿，居中的是法官受贿，最不可饶恕的是宣传部的受贿。

办法六，中央要重新打量中宣部的工作，要对中宣部的“忠诚”保持怀疑，要广泛倾听新闻界的呼声，吸纳更广泛的民间智慧，不要只听信、依赖中宣部的几个佞臣。

办法七，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是中宣部电话最常打来的地方，这里的记者和编辑要敢于坚持正义，要义无反顾地造中宣部的反。怎样造反？公开“叫停”的来由，使其干涉新闻舆论监督的丑行大白于天下。我们不能答应一个行为像下水道里的老鼠似的角色擅作威福，颐指气使我们，被颠倒的乾坤早该被颠倒过来。在中国新闻文明的进程中，中央级媒体应该挺直脊梁。

三、中宣部的极左根子从未被挖出

这些年新闻圈常用这个句式：“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某报道夭折了。”什么是“众所周知的原因”？实际就是宣传部从中横加干涉。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未能报道，实际上是说虽然是公认的荒谬、愚昧甚至反动的指令，可是你也不能不听它的。这等于认可了宣传部拥有颠倒黑白、强奸公意、指鹿为马、不按常理出牌、践踏文明常识的特权。众所周知的荒谬，而威力却如此之大，如此“神圣不可侵犯”，如此“不可向迳”，几十万新闻人，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没有人正面抗争哪怕半句话，实在是中国道德人格的耻辱！新闻圈里的人都说：“中宣部的权威只隔一层窗户纸，只是大家不愿捅破就是了。”为什么不愿捅？是不敢捅。为什么不敢捅？因为它太凶顽，它不讲理，更不讲法，好人不敢跟跋扈的恶棍较真儿。他加害了你，你连说理的地方

都没有，法院都怕它，不敢接你的诉状。这样的现实助长了宣传部的行不由径，致使其肆无忌惮地祭起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各种邪术法宝来。整个宣传部系统是中国新闻业正头顶上的一块乌云，是新闻记者的噩梦，它蔑视文明社会的一切是非曲直，冒天下之一切大不韪。它是党和政府民意基础的最大淘蚀者，是党和政府合法性的最大流失者，是中国弱势群体灾难的二级制造者。

中宣部为什么这么凶顽？第一，这是极左历史留给它的遗产。从王明、康生、姚文元、张春桥时代以迄於今，中宣部一直享有道德和政治上的免责权。它做到哪儿哪儿是边，即便事後证明宣传错了，鼓动歪了，“城头大王旗”可变，中宣部的地位却一成不变，什么责都不用负，一不用反省，二不用忏悔，三不用问责。反右期间，文革期间，以及後來中宣部搞的反这反那期间，抓意识形态的中宣部都红得像烙铁，毒得像异蛇，事後没有谁向它“反攻倒算”，追究过失。政治路綫变了，人事变了，中宣部作为一个机构的红和毒却一直没变。中宣部从来没有得到清算，它的角色没有变，它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从未被触动，它的极左性、悖逆性从来没变。要像清算王明、康生、姚文元、张春桥那样清算中宣部在过去历史时期的一切罪错。

第二，这是继承前此意识形态衣鉢的体现，固守着与时代相背的国际冷战思维。中国媒体说美国至今抱着冷战思维不放，中宣部才真正是冷战思维的烈女节妇。

第三，把 960 万平方公里国土看成是一小撮人的禁脔，各种在它看来不顺耳的发音器官都是没有发声资格的。须知中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是全体炎黄子孙的托身之地、庇护之所，任何异类，你是民运分子也好，你是六四流人也罢，你是法轮功练习者也罢，都是这片国土的合法继承人，都有平等地在我们祖先共同开发的这片老娘土上自由生活、自由表达、自由言说的权利。我即便是不爱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也有在这片热土上生活而不去逃亡、不去坐监的权利，因为这也是我的祖产。你中宣部部长的曾高祖在这片热土上耕耘过，他政治流亡者、持不同政见者的曾高祖也在这块土地上耕耘过，爷爷们的孙子是平等的，是应该坐在一张圆桌边共商国事的，可是中宣部是不许你这么看，这么说，这么商量的。

四、我敢喊出“讨伐中宣部”的十四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毛主席教导给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新闻圈早已在私下自由场合称中宣部是当下中国的反动派了。虽然反动派这个词有泛政治化倾向，有历史问题，不想使用它，可是揆诸中宣部的种种行径，除了这个词，别的词真的很难表达。中宣部的反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不背不盖赤裸裸的反动，是不折不扣的反动。“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第二个理由，这是我的宪法权利。共和国里不应该有老虎的屁股，共和国里不应该有任何免於诘问的圣物，共和国里不允许有欧洲中世纪的红衣大主教，共和国不是孔夫子的裤头，装着一个大圣蛋。

第三个理由，我比中宣部高明和文明。从上到下各级宣传部系统的工作，在我眼里就像一个愚妄之人不可一世地叫嚣着走向结薄冰的深湖，又好比街头恶棍行横，却没人喝令断阻，我是止不住要大叫阻止的。他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不利於任何人。他们自认为“守土有责”，是忠心耿耿为党和政府“看家护院”。在我看来，他们是陷党和政府於不义。他们出台的每一个“不许”，都经不起推敲，都是愚昧的结晶，都误党和政府的事业，报道上访会影响稳定就是最典型的例证。究竟会不会影响？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会怎么影响？他们调查过吗？他们研究过吗？他们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的？没有一点科学的影子，全是愚昧！全是懒惰！全是冷血！

第四个理由，他们对人类文明常识的践踏令我忍无可忍。他们不许媒体用“公民”一词，要用“老百姓”。不许民主、自由之类字眼随意上媒体，宪法上可以用，十六大报告可以用，普通人不能随便用，这分明是把民主、自由当摆设。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是人类之敌、文明之敌、民主之敌、自由之敌！这是敌我矛盾！这是对六十万中国新闻人最起码的职业理念的践踏，是对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最起码的人文情操的蔑视和挫伤。这种反对起码的新闻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行径，充分说明他们不是党和政府的思想卫士，不是“三个代表”思想的贯彻

执行者，而是愚昧落后文化的代表者，代表着人类腐朽的文化堕落沉沦倒转的方向。

第五个理由是我有好生之德。我不忍心看着中宣部这个机构就这么自我毁灭，更不忍心听任你们继续毁灭中国尚存的一息精气神。我必须像禅宗大师那样对你们施加当头棒喝：“休得无礼！不许走那条路！”

第六个理由，别的部和部长都可以成为媒体挑剔的对象，国家主席和国务总理的工作都可以批评，凭什么中宣部就不能被“说三道四”？司法部、公安部、铁道部、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等，及其部长，都受到过媒体的质疑和责问。特别是铁道部，年年像打狼一样受到新闻媒介的围攻，说春运涨价实在可耻，是“大发中华民族团圆财”。中宣部每一次发布“不许令”，新闻界都会经过一次全国范围的心灵折磨，整体地灰心伤气，骂骂咧咧，痛不欲干新闻，然而却向来无人敢反问一句：“你的‘不许’合适吗？你凭什么‘不许’？”如此不得人心，竟如此令行禁止，威力无穷，凭什么？凭什么宣传部就是猫，而新闻媒体就是老鼠？谁给中宣部这样被监督、被批评的豁免权？

第七个理由，中宣部副部长吉炳轩是河南人，2003年底他一口气发布二十五个不准时，新闻圈朋友聚会时总半真半假说“河南人都什么玩意儿！”一位级别挺高的新闻界朋友说：“春天他们这一届（中宣部领导）初上台时，加上正赶上非典，新闻宣传通气会上对媒体老总还客客气气的。现在，牛得很，凶得很，一点不客气！眼空无物，

去听精神的仿佛都是三孙子。”河南人抓意识形态让人不放心。向来中国灾难最重的是河南，河南灾难的总根源是河南官方的意识形态过敏。1942年河南饿死一百万，二十年後的1962年，河南饿死人更多，祸根都在地方行政官官迷心窍。河南的官员大多“忠心向上”，上边未必是那样的意思，跟来跟去实际上是跟了魔鬼。上边有上边的事，他不会觉察你看起来跟上面，实际上已经跟了魔鬼。於是你越跟越远，最後把自己跟成文明的罪人、精神的杀手。我不相信中宣部发布的二十五个“不许”是胡主席指定的，我相信完全是中宣部自行拣选出来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放手让同志们发挥主观能动性”，於是中宣部把领导人的信任做到於国於民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程度。“防火防盗防河南人”，这令人痛心，我们不能听任全中国的舆论环境都发生河南化。

第八个理由，这是我的一种文风自觉。梁啓超把时务文体发展至极致，胡适把白话文张扬到极致，徐志摩把新诗发挥至极致，鲁迅把杂文发挥至极致，李敖、柏杨、王朔、孔子、孟子、曹雪芹、唐宋八大家各臻其极。他们的每一个极致，都为汉语文和汉民族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也希望把这种不忌生冷的文风发展之极致，为汉语文和汉民族的发展略尽绵薄。书生报国无长物，惟有手中笔如刀。

第九个理由，前辈的鼓舞。三百六十年前弥尔顿写了《论出版自由》，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写了《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一千五百年前骆宾王写了《讨武照檄》，尼采说“上帝死了！”章太炎斥光绪帝是“载恬小丑”，梁啓超嘲罵袁世凯“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五四先

驱喊“打到孔家店！”张季鸾数说“蒋介石的人生观”，郭沫若叫人“试看今日之蒋介石”，傅斯年写文章《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倒“皇亲国戚”，前贤相望，史不绝书，我说句“这个样子的吉炳轩非走不可”，或喊一声“讨伐中宣部”，较之这些前辈，有什么大不了？实在小菜一碟。再者，新闻媒体上国外整天喊总统不称职，要下台，部长有劣迹，快滚蛋，我就不信中国人喊一句“讨伐中宣部”就是大逆不道，就该死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弥尔顿的知识者不是好知识者，我想做一个好的知识者，我想做中国的弥尔顿，我想让这篇《讨伐中宣部》成为彪炳史册的历史文献，就像《论出版自由》一样，就像《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一样。

第十个理由，为後辈造福的欲望。拯救中宣部，为後辈开辟幸福自由的源泉。都21世纪了，公民、民主这些字眼都成为忌讳，这灾难太深重了吧？何时是尽头？鳞介羽毛尚知为子孙计，何况我方颇圆趾的人类？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文王谔谔以昌，纣王默默以亡。

第十一个理由，人不亲行亲。你中宣部是抓新闻工作的，我是研究新闻工作的，新闻工作的抓法也是新闻研究的对象。我们本是一家，共同对同一个“东家”的兴衰负责，那就是中华民族。我们应以辐辏之势指向我们共同的轴心——父母之邦、炎黄之族。我不对你可以修理我，你不对照熊你三孙子，咱谁也别客气。

第十二个理由，生态学的依据。螳螂捕蝉，黄雀在後，苍鹰更後。权力产生腐败，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中宣部如此绝对的权力为什

么就没有监督？谁能保证它不腐败、不以权牟利？中宣部後面也应该“黄雀”，没人敢追问他打一个“不许报道”的电话背後是不是收受了别人的贿赂，这是生态学常识不能答应的。恐龙没有天敌，最後还是灭亡。大家彼此应该“互相监督，切莫违犯了”。

第十三个理由，大不了一死，我还正不想活了。每听说中宣部又出台新“不许”，我就恨不得一口气把自己憋死算了。或者离圆明园、颐和园都很近，那里到处是荒林子，足可用於上吊的树枝有一千万个不止，找个僻静之地，“自挂东南枝”，不看这个世界了，向王国维先生学习。这都是什么混帐“不许”啊！实在没什么法子让中宣部醒来呀！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轻於鸿毛。读研究生时一师兄常说：“司马迁写《史记》蛋砸三砖。”蛋砸就砸了，可你要不让他写《史记》，成吗？我想遍宪法、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种法，讨伐中宣部该不着死罪。既是“活罪”，就更没什么好怕。不就是蹲大狱吗？没准还捞个“秦城待遇”。蹲秦城是以肉身存银行，有利息，不贬值。现在凡叫得上名字的老人物，有几个没蹲过秦城？甘地说监狱是大英帝国免费的旅馆，住着很棒，一日三餐很省心。中国监狱与大英帝国的监狱在这一点上文明程度一样，也是全免费的（曾经有一个时期不太一样，枪毙一个“反革命”，那“反革命”的家属得拿五毛钱的子弹费，不然不得收尸）。不就是性生活悬空吗？练“在狱出家功”可也。不就是吃不好吗？还能比上高中、上大学差？高中、大学时我就饿过肚子，没什么大不了。受过苦的人有担待。前几天看凤凰卫视，许戈辉采访丁玲老伴儿陈明先生，说秦城伙食不孬。那是什么时候啊？正当物质匮乏。现在，全国人民都不挨饿，还能亏了秦城人？不就是可能挨点

儿小打吗？我一受刺激容易休克，像有些昆虫的假死。一打，假死了，谅他再也不敢打第二次。话说过来，打死也没什么，孙志刚不是就被打死了吗？不死哪能成圣啊？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想成圣贤不顾老婆孩子。这一点西方人更可取，想成圣贤就不成家，当年来中国传教的那些耶稣会士，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辈，就是这样，终生“不婚不宦”。如果让我自己“定罪”，我既不该死罪，也没有“活罪”，讨伐中宣部，推动中国当代社会文明，功劳反倒是大大的，大英雄一个，跟前面提到的诸位前贤一样，足以名垂青史八千年。

第十四个理由，我对苦难的敏感度比较高，对不公正的麻木度比较低。上访和民工欠薪二事，谁要说影响稳定，不能报道，我就特别痛恨他。2004年元旦那天，胡主席对全世界作个简短的新年献词，呼吁、祝愿世界和平。听了我很生气。呼吁、祝愿什么世界和平啊，呼吁拖欠的民工款全还了就行了！祝愿全中国上访者委屈的心都得到平复就足够了，就功德无量了！元旦夜里，我做个梦，梦见我去颐和园游玩，一个人影都不见，偌大个园子里就我一个游客。我疑疑惑惑、意意思思地走，就这么来到十七孔桥上。低头一看，桥拱最高处有一双鞋，鞋尖正对着北边的石栏杆，放得特别整齐。人投水死了，剩下一双鞋，让人留意。这是我见这双鞋子的第一个感觉。接着一个感觉是发现这双鞋竟是我自己的！我已经投昆明湖死了。我不信我死了，我要寻找没死的证据。末了我发现鞋里有一封信，是写给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信的大意是，你们为什么不下死命令解决民工欠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壮士断腕，下死力解决上访问题？今天我要死给

你们看！明年再有欠薪，再有上访，我在阴曹地府决不饶恕你们！瞧瞧，我已经在梦里“死谏”，抗议政府对上访和欠薪长期的麻木不仁了！

五、确立科学的稳定观

现在中央要求各级领导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我看树立科学的稳定观也是当务之急。中宣部动辄以影响稳定为由封杀新闻传媒，我们必须重新打量这个理由，培育起科学的发展观。据我思索，稳定有三种状态：一是常态稳定，一是不稳定状态，一是超稳定状态。超稳定状态就是死态，就是化石状态。中宣部现在搞的稳定就是超稳定状态，中国新闻媒体已经被它搞成化石。

以影响稳定为由封杀新闻报道的原因也有三个：一个是中宣部冷血愚昧，像报道上访、欠薪会影响稳定，报道计划生育的野蛮做法会影响国家形象，诸如此类，都是愚昧冷血造成的。如今关于欠薪的报道这么轰轰烈烈，不仅没有影响稳定，反倒国家因此稳定许多，政府因此亲和许多，这充分证明过去中宣部以影响稳定为由，扼杀新闻监督的行为是多么的愚昧和大错特错。它大大推迟了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在世界国家之林为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抹了太多的黑。

再一个原因是中宣部官员的权力寻租，这边拿了人家的钱，转脸就以影响稳定的名义喝令《焦点访谈》或其他什么媒体不许报道。据可靠消息，没有中宣部摆不平、封不杀的媒体，只有新华社的内参除外。所以给中宣部送钱免灾的恶人都知道，如果是被新华社内参盯上

了，上供中宣部也不好使。每当被中宣部指控为影响稳定，从而加以封杀时，我们就要厉声问一句：“影响了谁的稳定？”影响了国家的稳定吗？非也！影响了腐败分子的稳定！影响了宝马案肇事者的稳定！影响了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稳定！针对中宣部号称的“稳定压倒一切”，我们不能不问一声：“谁的稳定压倒一切？”从中宣部叫“停”的一个个报道里我们看到，是腐败分子的稳定压倒一切！是邪恶势力的稳定压倒一切！是欺压良善小民的恶人的稳定压倒一切！是有钱给中宣部上供的人的稳定压倒一切！是克扣民工工资的工头的稳定压倒一切！是逼迫苦难的人民千里万里走上无尽头的上访路者的稳定压倒一切！

第三个原因是确实可能影响稳定，於是喊“停”。对此我们要思量：到底影响的是哪一种稳定？是常态的稳定，还是超稳定？如果影响常态稳定，是该喊“停”。如果影响的是超稳定，那是应该影响影响的，再不影响影响就死屁了，万马齐喑。什么是常态稳定，什么是超稳定，什么是不稳定，必须有个科学的指标，而决不能允许像过去那样，跟着冷血、愚昧、贪贿者的感觉走。中宣部对中国文化事业的管理，远远比三百年前的大英帝国对新闻出版事业的管理还要落後。对此我们不能无动於衷，中宣部的意识形态恐怖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头号大怪物、大毒瘤。

已经是数字化时代，中宣部的决策也要数字化。已经是透明的时代，中宣部的决策也要透明化。找遍北京的街道，你看不见“中宣部”的招牌；拨北京的114查号台，你查不到中宣部的电话；网上搜索

“中宣部”，你得到的是白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闭目塞听，一不变应万变，悖逆时代而存在的“机关”！中宣部是地下党，还是黑社会组织？它为什么胆敢这么无视公衆对中宣部的知情权？中宣部早已不是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看门人，而蜕变为有着独立经济利益的险要“机关”。它拥有对全国庞大新闻业说一不二的“叫停”特权，它安享着“说你影响稳定你就影响稳定”的鉴定垄断权，和由此带来的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油水的非法利益。已经是听证的时代，中宣部每发一号，施一令，也必须建立在严格科学理性的基础上。保守的，历来以极左闻名的，冷战思维子遗的，谁也说不清它究竟接受过多少黑钱，谁也说不清它究竟曾迫使多少弱者和受害者在媒体上失声的中宣部，该彻底清算了！谁左谁当宣传部长的恐怖时代该终结了！

作者附记：这篇文章断续写了四个月，写成也没地方发表，不算科研成果，不拿稿酬，只希望以网络揭贴的形式，让它传遍天涯海角，传遍全球，最好翻译得比《共产党宣言》的版本还多，以形成推动中宣部改革或改组的社会压力。有本事的人可以把它转发给胡主席、温总理、李长春及中央政治局其他每一位常委、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光明日报总编辑赵德润、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的总编辑等。当然，也可以转发给中宣部的领导刘云山、吉炳宣等，给他们来个冷水浇背，当头一棒。我与中宣部领导个人远无仇，近无冤，我只对事不对人。如果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悬赏 200 万欧元，请此文的作者领赏，届时胡主席（李长春同志也行）在人民大会堂发奖，那时我将现真身。

《环球时报》专捧老年独裁者

焦国标

《环球时报》是大陆最成功的专司国际报道的报纸。对于中国读者的国际视野而言，这家报纸既是功之魁，同时也是罪之首。眼下中国民众中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我看来起码有八成是它煽乎起来的。中国人在国际政治问题上已经越来越变得吃屎不知香臭，美国9?11发生时无数中国人为之鼓掌欢呼就是明证。将来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如果真有什么走火入魔的事发生，应该先拿这家报纸是问，它得承担八成责任。不过这里我不谈它的煽乎民族主义，只历数它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老年独裁者捧臭脚的报道。这种报道让普通中国读者失去辨别狗屎的嗅觉。

2004年10月20日晚上，古巴老年独裁者卡斯特罗在一次群众集会中，一脚踩空，摔裂左胳膊骨，左腿膝盖骨碎裂。两个月以后，12月23日，卡斯特罗又出现在古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现场。对此事件，12月27日《环球时报》以“伤病很快痊愈已能稳健行走”为眉题，以“古巴为卡斯特罗欢呼”为主题，予以报道。报道者是本报驻委内瑞拉特派记者刘宏。报道中写道：老卡在少先队员陪同下“稳步走向大会主席台。在场的六百余名代表起立高呼‘卡斯特罗万岁！古巴自由万岁！’人们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欢迎这位坚强的

革命老人。卡斯特罗面带笑容，不时向现场代表和报道会议的各国记者挥手致意。”

在这篇报道里，卡斯特罗慈祥得像一个祖父，一个弥勒法佛。试问去年三月他一次抓拿七十五名有的比他孙子还年幼的“反革命分子”时，他还面带笑容吗？在六百多人高呼“卡斯特罗万岁！”的背後，记者刘宏先生你想过没有，这个“革命老人”在他半个世纪的独裁统治时期制造过多少冤假错案？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个数字。《环球时报》从来没报道过这样的消息和数字。可是我坚信他制造了太多的冤假错案，为什么？毛泽东独裁二十多年就制造那么多，他比毛泽东长一倍，你想去把！

“据介绍，卡斯特罗迅速康复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卡斯特罗知道自己能早日康复，就是对古巴人民的最大鼓舞和对敌人的无情打击。”敌人是谁？当然是美国。“卡斯特罗迅速康复，令古巴人民和所有关心他的人们欢欣鼓舞。但这是古巴的夙敌——美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至今，卡斯特罗依然活跃在古巴政坛上，而美国已经换了数位总统。”这话的意思是，美国哪个总统也赶不上老卡福寿绵长。记者这话真是吃屎都不知道香臭了！

按道理说，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人士应该是人文素养很高的群体；就其职业而言，无疑属于令人羡慕的群体。然而，他们一些人的新闻报道作品里传达出的人文品位和专业水准之底，实在不敢恭维，其中所散发出的腐朽落后恶宿之气息，甚至有令人掩鼻者。

《环球时报》2003年4月28日第八版头条，眉题“不怕受到攻击，经常仗义执言”，主题“马哈蒂尔敢於批评西方”。这样的标题就很值得推敲，它意味着：谁“敢於”批评西方，谁就是好汉，谁就是“仗义执言”。苏哈托、萨达姆之流过去就是批评西方的急先锋，他们究竟是好汉还是恶棍，历史已经做出判决。不仅如此，这样的标题其实还隐含着另一个更大胆的前提：西方都是不义之徒。西方是不是不义之徒，需要具体分析，如此不分青红皂白，起码是对世界政治文明发展大势缺乏洞察。笔者认为，马哈蒂尔批评了西方的什么，是怎样批评的，制进标题就完了，不应作这种既缺乏国际政治眼光，又虚与不实的标题。

这篇报道暴露记者人文品位低下，甚至是最为低级趣味之处是關於马哈蒂尔的年龄问题。“1981年他首次当选马来西亚总理，此後四次蝉联至今。”“目前连续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家领导人中，除了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外，就数马哈蒂尔了。”“77岁高龄的他一直忙着主持会议，会见各国首脑，但看上去却精神饱满，毫无倦仪意。”“马哈蒂尔已年逾古稀，他多次表示要告老还乡。目前，马来西亚国内政治经济稳定，也许他认为是急流勇退的最佳时机。”

以目前的人类政治文明水准而论，无论他做出多么大的成就，国家领导人高龄在位和长期在位，都不是一件光彩夺目、值得歌颂的现象。二次大战之後，英国首相丘吉尔功劳可谓大矣，英国大选还是将他淘汰出局。国家高位，不是荣衔，也不是一种报答。老子说：有大

功的人，只有不居功，功才不离开你。言下之意是说：有功而坐在功劳簿上，功就离开你了，也就是说你就没有功了。

作为驻外记者，对于高龄在位和长期在位这种现象，即便不在自己的新闻报道里加以明确的贬责，最起码你不应该采取赞美歌颂的态度。可是从上面引用文字的口吻可以判断，报道者认为连干四届是体面之极的事，做各国家领导人中的高寿亚军，实在是太令人羡慕了。依据这样的逻辑，我们可以推论出报道者的价值观是这样的：终身制更了不起，世袭制则堪称伟大。也许这并不是报道者的本意，可是他的口吻给读者感觉就是这样的。无论是哪种情况，作者都有错：要么价值观错，要么文字表达错。

高寿，人所欲也，我们可以赞美高寿的老人，但是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一个国家领导人其高寿本身不应该成为歌颂的对象。终身握权柄，世袭掌国玺，人之所欲也，可是在主权归民的现代政治理念里，一切终身制或世袭制的做法，哪怕是终身制或世袭制的念头和嫌疑，都应该是口诛笔伐的对象。

中国人有敬老传统，高寿的、在位久长的帝王尤其令中国人称美，比如康熙和乾隆。乾隆还号称“十全老人”。这种关于高寿的传统文化心理，特别是关于君主高寿的文化心理，“力透纸背”，不知不觉渗润到马哈蒂尔或牛哈蒂尔身上去。可是须知现代不同了，马哈蒂尔总理不是终身制的皇帝。他的连干四届，他的77岁高寿亚军，你即便不表态予以批评，起码不应该极尽歌颂之能事。

2003年初，全球不结盟国家在马来西亚举行会议，当今国家领导人中的高寿冠军，马哈蒂尔的老哥哥，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卡斯特罗顺道到中国访问，千龙网站专此组织一篇从头到尾洋溢着无限赞美热爱之情的卡斯特罗小传，“希望借此能让大家了解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古巴领导人”。其中写道：“环顾当今世界政坛，能数十年一贯受到本国人民拥戴，又始终受到国际舆论极大关注的政治领袖已为数不多，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政坛上曾经叱咤一时的诸多风云人物中，至今仍稳坐江山的惟有卡斯特罗。他领导1200万人口的小小的古巴，与拥有2.5亿人的‘超级邻居’长期抗衡，如此豪情胆略令世人侧目。虽然他自称是‘属于已经过去了的世纪的人’，但是人们看到，他依然活跃在新世纪的国际舞台上，不仅在各种会议中铿锵有力地发出古巴的声音，更在一些人们料想不到的场合中出现，尽展魅力和风采”。

我们对卡斯特罗本人行状功过的褒贬搁置起来，只就报道本身立论，“数十年一贯……至今仍然稳坐江山的惟有卡斯特罗”这样的用词，这样的口吻，总不能说是报道者人文品位高贵、政治趣味不俗吧？

与上述马哈蒂尔的报道同一天的《环球时报》第九版，还刊载一篇介绍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的文章。眉题是“半小时会议晕倒两次 八十高龄欲再连任”，主标题是“阿塞拜疆总统不服老”。文章开头第

一段写道“如今，他依然宝刀不老”，後面还有“近4年来就做了3次手术”的事实。

如果说马哈蒂尔那一篇标题里有明显的国际政治逻辑不当的话，那么这篇阿利耶夫的标题里有着扎眼的逻辑问题：已经八十岁了，半小时会议两次晕倒却还要连任，这本是十分可鄙的事，可是报道者却用了—个在中文里十分褒义的词“不服老”。当然，“不服老”也可以做中性理解，并无褒义，只是表述阿利耶夫的这种状态，可是“如今，他依然宝刀不老”这句话就实在一点逻辑不讲了。既然已经说他八十岁了，半小时会议两次晕倒，而且近4年做了3次手术，对这样一个对象，用“宝刀不老”—词是不是用词也太不当了？你决不可能不知道“宝刀不老”在我们中文里是什么含义。

这三篇关于高龄、长期的领导人的报道，除了流露出报道者的政治文明水准低下，人文趣味不高，还表现出报道者在新闻业务素养上有明显缺欠。文字表达上的逻辑问题不说，新闻报道要客观，用词要中性，要多用事实，少用判断，这是最起码的业务要求。可是，这几篇作品里满篇是赞美歌颂之词，只见判断，少见事实，或者事实多是很经不起推敲的事实。比如“当谈到马哈蒂尔时，马来西亚人无不表露出爱戴之情，高度赞扬他为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尽管在交权给儿子（阿利耶夫想让儿子接班，搞世袭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国际报道应该有明确的态度，那就是不齿，贬责，可实际相反，赞赏不已）的问题上遭到反对，阿利耶夫还是很受老百姓爱戴的，几乎所有官员的办公室里都挂着总统的画像，大家把总统的经典言论作为自己

的座右铭”，“老阿能够成为政坛常青树，而且一直深受百姓爱戴、官员拥护、敌手敬畏”，等等。“马来西亚人无不……”云云，你记者怎样得出“无不”的结论？且不究阿利耶夫受不受老百姓爱戴，起码由官员办公室里挂总统画像的事实，并不能得出受“老百姓爱戴”的结论。官员是官员，老百姓是老百姓，不一回事的。这叫材料与结论不照应。至於挂总统画像，把总统经典言论当座右铭，说白了不就是跟中国文革时期一样，挂毛主席像，背毛主席语录吗？对这种似曾相识的现象，中国记者作为从那一段恶梦般的岁月里走过来的人，如此赞赏的表述实在令人费解，甚至令人感到遗憾、愤慨。

从事国内报道的记者，在报道本国领导人时，久已不再使用如此的措辞和口吻。也许是由于中国“天子圣明”、山呼万岁的历史太久了，这种笔触中国本土行不通了，却在国际报道中找到任意发挥的天地。这是一种传统的余毒，尽管发作在报道外国领导人的作品里，我们仍然要当心。国际报道从业者，多半是外语科班出身，读书期间大量的时间花费在外语上，政治人文素养是很边沿的科目，新闻业务素养更是急用现学的东西，很难入心入脑扎下根来。

人文理念，包括一些新闻理念，对于新闻记者，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方向性的东西。在你的职业生涯乃至整个人生里，说它是启明星，是北斗星，一点都不过分。

《环球时报》捧老年独裁者臭脚，尤其酷爱卡斯特罗，已经很久了。1999年该报头版头条曾登载一大篇文章，主题是“卡斯特罗不信

邪”，副标题是“不怕美国封锁，坚持社会主义”。很明显，文章的逻辑是：美国邪，卡斯特罗不信邪。看了此文，我倒强烈地感觉到，美国邪在何处没有充分报道，卡斯特罗的邪倒是十足的。而且，此文的内在逻辑也够邪的。

先说卡斯特罗有多邪。卡斯特罗是1959年1月1日起义胜利入主哈瓦那的，到今年1999年多少年了？整整40年了，卡斯特罗本人也73岁了。一个人连干40年，也不分个届次，终身制不再是野心，而是事实。根据历史，一个人干40年，不是封建专制，必是法西斯统治。否则他客观上干不了这么多年，自己主观上也不愿干这么多年。按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要先进一个档次。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严格分届次，执政期限有严格规定，每届三五年，连任不得超过三五届。社会主义既然比资本主义先进，领导人的任期起码不能比资本主义的更长，届数起码不能比资本主义的更多。任期越长，届数越多，离君主制越近，离资本主义越远，离社会主义更远。卡斯特罗这个自号社会主义的掌旗人可好，一干一辈子，这是哪家的社会主义？这是卡斯特罗的一邪。

一干一辈子就一辈子吧，他还要指定继承人。1998年10月古巴共产党五大上，再次（第一次是什么时候，文章中没有说）确定了劳尔·卡斯特罗作为卡斯特的继承人地位。指定继承人就指定继承人呗，你猜这继承人劳尔·卡斯特罗是谁？是卡斯特罗他自己的亲兄弟。而且这老弟弟也七十多岁了。您说这是啥事儿？这是兄终弟及呀。再说，您搞兄终弟及也找个年轻点儿的呀。不过如果当初父母压根儿

就没有生养那么多儿子以供今天这个出息的儿子选择继承人，那就不是老卡之过，而是卡老父母之过了。

有人要问了，什么是兄终弟及？古里古气的！就是哥哥死了弟弟继承王位。听起来古，内容还倒挺新鲜，第一次听说。新鲜个鬼！咱中国三千年前就这么干了。商朝，就是夏朝後面那个商朝，就这样继承王位。如此说来，咱中国可够先进的？是啊。可从卡斯特罗那面看，可够落後的呀，三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到现在他还采用。是啊，要不怎么说卡斯特罗够邪的呢。这是卡斯特罗第二邪。

第三邪，他自己一辈子搞终身制，不尽兴，又恢复采用了三千年前中国的国粹兄终弟及。就这么一个权令智昏、藐视世界进步潮流的人，你听他在1999年元旦之夜，也是古巴革命胜利40周年的讲话：“古巴现在是抵禦世界资本主义体制冲击的堡垒。我们是在为古巴和世界人民而斗争。今天的战斗更加残酷和困难。”说这话好不害臊，就拿你那终身制，你那兄终弟及制，也想抵禦资本主义？也不掂掂自己的斤两！什么抵禦？倒行逆施罢了。

古巴人民是否委托你为他们斗争，这我不知道。我想问问卡斯特罗先生，世界人民什么时候委托你为他们斗争的？李敖说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叫嚣和准备是手淫台湾，意淫大陆；王小波说现在国学派张皇其事是手淫大陆，意淫世界；卡斯特罗这分明是在手淫古巴，意淫世界！他这种五六十年代中国人人人会说的冷战语言足以证明，老卡斯

特罗心理已经完全变态了。他完全生活在二三十年前，不是虐待狂，就是受虐狂。

想起来至今古巴人民还笼罩在冷战语言冷战思维里，真是止不住悲从中来！卡斯特罗在结束演讲时高呼：“社会主义，或者死亡！”这是一个欧化句子，意思是要么社会主义，要么死亡，决不与资本主义共戴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真的那么水火不容吗？只有总统制与终身制和兄终弟及制的水火不容，决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水火不容！印度从1971年以来就有社会主义的西孟加拉邦存在，现在有3个邦在印度实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印度和平发展，平等竞争，何曾你死我活过？卡斯特罗即便是不睁眼看印度，起码也得听听邓小平哥哥的话：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没有天堑鸿沟，更没有你死我活。

卡斯特罗第四邪。卡斯特罗好像是在哪个大学拿的法学博士学位。法学是确保人类社会进步文明的最有力的学科，法学博士本应该为人类更民主更文明而奋斗，谁曾想到头来法学里竟然孕育出一个妖怪！看来中国强调红专教育是对的，只专不红，必然越专越黑。一个法学博士，怎么用法理学解释终身制和兄终弟及制？以法学博士之身而行终身制，行兄终弟及制，是法学的叛逆，是对博士学位的亵渎。

卡斯特罗的邪就说到这里，再看看这篇文章的邪。上述的卡斯特罗已经够邪了吧？卡斯特罗千好万好，就冲他这终身制和兄终弟及制，就可以断定为人类公敌。可这篇文章居然说“卡斯特罗不信邪”，俨然

卡斯特罗其正无比。这不是颠倒邪正、混淆黑白吗？世上还有没有是非了？六七十年代，中苏闹崩，古巴甘心做苏联的跟屁虫，那是中国的二号敌人。八十年代末，苏联这回真的“变修”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终身制要变成总统制了，终身制没有了，世袭制更没门儿，卡斯特罗哪肯跟着变呐，于是他跟苏联、俄罗斯分道扬镳，照样玩他的终身制游戏。哪曾想，从那以后，卡斯特罗因祸得福，成了中国领导人的精神夥伴了，鬼使神差一般地得到中国政府的青睐，拿他来证明社会主义不倒。苏联扔了的一只破鞋，倒被中国政府成洁白的哈达挂在脖子上。苏联的走狗，被中国领导人当成坐上宾。难道恶人也有天相？

社会主义不倒固然需要证明，可你也不该抓住什么是什么呀！拿搞终身制、世袭制的人证明社会主义不倒，这不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吗？这不是恶心社会主义吗？除了古巴，还拉住个朝鲜做证据。朝鲜是什么东西？是终身制加纯粹世袭制，这是中国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禹传子，家天下”时产生的极其破、极其破的破玩意儿。五千年以后了，倒行五千年，某些混了头的中国政治糊涂蛋竟以此证明社会主义大旗不倒。民主人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社会主义现在是低潮，朋友少，知音少，太寂寞，太孤单，得找朋友，可你也得找体面的朋友哇，像终身制加世袭制的朋友，终身制加兄终弟及制的朋友，那是不齿於人类的狗屎堆，你把他们拉进国际保护伞，划进社会主义的范围，那这社会主义成了什么东西了？那不是藏垢纳污的国际垃圾堆吗？那不是国际倒行逆施者的跨国俱乐部了？谚云：“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湿婆下假神。”与世界文明的这些残渣余孽称

兄道弟，中国有好儿吗？谁是恶棍，谁就是英雄，就结交谁，这都是什么外交嗜好哇？好交恶棍是传统农业社会里的人的普遍行为，中国真不愧是个农业国。

文章还说：“古巴经济仍很困难，但大多数古巴人都支持和拥护卡斯特罗政权。”他敢不拥护吗？现在大家都可着劲儿说毛泽东这错那错，搁到六七十年代，你敢吗？不吓死你！您记住我这句话：一个人凡连干三四十年，不是暴君就是法西斯。不然他干不了这么多年，他也不应该干这么多年。这不是我闭门造车造出来的警句格言，而是迄今为止全部近现代人类史的完全归纳。暴君、法西斯，他要不死，谁敢不“支持和拥护”？我们等着瞧，只要卡斯特罗足够长寿，他就有自己演苏哈托的那一天。如果他不够长寿，我们就有像看斯大林身後一样看卡斯特罗的那一天。

《卡斯特罗不信邪》一文的作者最後打保票：“只要古巴共产党内部不乱，古巴社会主义大旗不会倒下。”可真叫糊涂，古巴那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什么时候说过社会主义大旗可以终身制着打，兄终弟及着打？马克思、恩格斯上千万字的著述里，你可曾找到世袭制下也可照样叫社会主义的文字？社会主义是科学规律还是几个小丑人为？只靠几根倒行逆施的枯木支撑的社会主义决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老自号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可这口吻分明是赤裸裸的历史唯心主义，是资产阶级英雄史观。无产阶级的报纸，兜售资产阶级英雄史观的黑货，还不够邪吗？

《环球时报》，你走得够远了，你必须对中国读者健康的国际政治文明常识负责！你可能说，那是读者爱看，我们也没办法。可是你知道，咱们中国目前没有起平衡作用的报纸，具体说，你果然有歌颂老年独裁者的自由，可是没有哪一家报纸有谴责老年独裁者的自由；在这样的格局下，你必须当心你正在起的作用！

（编注：这是作者多年跟踪《环球时报》关于邪恶反美英雄卡斯特的报道而断断续续写下的文字，期间曾经试图在大陆报刊发表未果。）

中国大陆信息猪圈共有几块顽石砌成

焦国标

中国大陆对民众实行的严密的信息封锁，我为此感到特别痛心！

他们为什么要搞信息封锁？目的显而易见，要愚民，要他们的食物链下端永远这么愚昧和软弱。德国十八世纪的著名哲学家费希特曾经声讨过当局的愚民行为：“至少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我周围的人们不应当变得更聪明和更优秀。……我不愿变得更文明，我不愿变得更高尚；黑暗与撒谎是我天生的爱好，我愿使尽最后力量，不使自己放弃这个爱好。……这些人类的敌人阴险无地，比圣经给我们描写的那种敌视人类的东西还狡猾地思考着，盘算着，在最神圣的深处搜寻着他们向人类进攻的突破口，以便把人类毁灭在萌芽之中。”

在我想来，除非我把民众想象成可以宰杀肉食的猪羊，否则我干不下这样狠心的事。可是他们不是猪羊啊，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啊，我们有共同的祖先。你们每年做张做势、乔模乔样地祭祀黄帝，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子孙对子孙就这样啊？食物链是永远的，民众永远是统治者食物链的下端，可是下端与下端内涵不一样啊。夏桀殷纣食物链的下端与文帝景帝食物链的下端过的日子能一样吗？隋炀帝的百姓与唐太宗的百姓心情不同，乌干达的人民与瑞士的人民生活完全不一样。所以这里我不忍心用文绉绉的词“信息封锁”，而采用道义色彩浓厚的词“**信息猪圈**”。有网友说见过我，说我脾气很躁。请原谅，我

要反唇相讥了，你脾气很肉，你很麻木，你很迟钝，你很冷血，你很弱智。

那么大陆信息猪圈都有哪些石头砌起来的呢？石头很多，有大有小，是全方位的、无孔不有的，不能尽举，想到多少说多少吧。

大陆信息猪圈起码可以分两层，就像过去的城市有城有郭一样，又像过去富人的墓葬，有内棺和外椁。大陆信息猪圈的外郭是一道把中国民众与外国隔绝开的信息壁垒。所谓外国，其实就是西方，不可能是黑非洲，也不可能是拉美。所谓与世界接轨，其实是与西方接轨；所谓全球化，实际上西方化，可是大陆不许这样实际着说，不然不是太长西方的志气，灭我们的威风吗？不然不是让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做我们的老师了吗？再说我们社会主义优越，逻辑上讲不通啊。

一、屏蔽外国信息的十四块臭石头

这道隔绝中西的猪圈外郭有下述几块大顽石构成。

第一块是不许西方记者自由进入中国采访。建国後二十多年，中国境内几乎没有西方记者。既没有西方记者，国内把老百姓折腾成什么样也没有人知道。既屏蔽西方信息，所以国内民众谁也不知道西方什么样，只知道除中国人民之外，其他全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援救。实际上，即便是中西隔绝的五六七十年代，大陆上层仍然可以吸洋烟，喝洋酒，女仕用洋货，穿洋装。这些资料你可以在零

散的历史资料里面看到。我看《往事并不如烟》，罗隆基被打成右派，还有洋雪茄抽，不是因为他留过洋，是因为他当过林业部长。

改革开放之後，西方记者可以进来了。可是并不是西和西方媒体都到中国来开记者站的，哪些能进，哪些不许进，要经过政治挑选。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媒体不许进来是说不过去的，如《纽约时报》、路透社、《读卖新闻》之类。除此之外，那就看对大陆的态度了，只有那些对大陆比较“友好”的媒体才准许进入。所谓“友好”媒体，实际上是只讲商业道德，不讲新闻职业道德的媒体，或者准确说是新闻职业道德让位於商业道德的媒体。它们首先考虑的是在大陆扩大其覆盖范围，如果一定程度上做大陆官方的应声虫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不妨就做一把应声虫。进入大陆的海外中文媒体基本上都要过这道良心关。香港媒体最有代表性，捧大陆官方臭脚越下作，在大陆就越有发行空间，那些对大陆官方持批评态度的香港媒体进入不了大陆。

美国之音勉强可以在大陆设记者站，自由亚洲电台就不可以。自由亚洲电台一位记者，中国南通人，曾写过一篇大陆报道，批评了外交部某位官员，被划入黑名单。父亲病重，申请回国探望老爹，睚眦必报的家夥们终於得到一个可以施展报复的机会。折腾一个多星期，人可以入关了，可到家老爹早咽气了。这桩个案，不仅违背起码的新闻文明，记者本来就不是专职吹喇叭的，更不是全世界的记者都是为你吹喇叭而成此行当，而且摧残了我们中国人最传统的伦理亲情。在这帮家夥眼里，真的是无所畏惧，人类文明准则狗屁都不是，传统的亲情更是一文不值。他们不仅是人类文明之敌，也是民族文化之敌。

所有能够被绑架的东西，从广袤的领土，到巨大的商业定单，到传统的伦理亲情，都被他们绑来用作伤天害理。有人说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绑架了整个穆斯林世界和伊斯兰教，我说中国的一切，从物质财富到精神文化，都正在被要挟，被绑架。

外国记者能进大陆，那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多的考验还在后头。大陆信息猪圈的第二块顽石就是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必须件件都要打报告写申请。驻北京的记者，不能随便出京采访，要采访什么必须向有关方面申请。如果出京采访，必须有地方外事办工作人员陪同。总之，按规定，你没有任何自由采访的余地。采访突发新闻也要申请吗？当然。这个规定显然并不现实，许多新闻特别是土法新闻是容不得层层打报告写申请的，因而外国记者实际上并不完全按这个规定行事。一般说来，如果采访正面的、不太有时效性的新闻，他们就会打报告申请采访；如果欲采访负面新闻，只能“偷偷摸摸”，违规行动。按道理说，既然一项规定不现实，那就快点改呀。不，人家不改。如果不现实就马上改，怎么才能体现我官僚主义呀，怎么才能体现我逆潮流而存在呀。

一位日本记者告诉我，前不久他去江西瑞金采访，一切按规定行事，向瑞金政府外事办申请。外事办答应了他的采访要求，他高兴兴去了。结果，外事办狮子口大开，采访五天，收费八千元人民币。每天有三个外事办的官员陪他一个人采访，只能在瑞金城裡瞎转悠，乡下还不能去。更近一些时候，大约是我们这次谈话前的一个月，他想去河南开封采访刘少奇的遗迹，好像一个纪念馆开张了，他想去看

看。人到郑州，省外事办告诉他，这个纪念馆没有开张，不能去。他想，既然到这里，不能空手而回，不开也去看看，於是就决定游客身份去一趟开封。到开封一看，纪念馆一直开着张呢。堂堂正正的省直政府机关，怎么可以这么骗人呢？

你瞧，有资格在大陆设立记者站的外国媒体，在中国采访有多麻烦，多窝心。《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你外国记者想“不论国界寻求消息”，去美国可以，去中国，对不起，不可以。

第三块顽石是把大陆分为开放地区和非开放地区，开放地区外国人可以进，非开放区外国人包括外籍华人都不能进。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当然都是开放地区，河南的爱滋病村当然都不开放，一家人只有一条可穿的裤子的地方，生了孩子没东西包扎、直接埋进灰窝里吸干的地区，外国人是不能进的。我们知道，越是贫穷落后的人们越需要外界知道他们、关爱他们、帮助他们啊，可是你需要，他们“有国者”不需要，他们需要脸面。殊不知，对外国人封锁贫穷落后地区之举本身已经是最可耻、最愚昧的行为，因而也是最伤体面的政策。“一国两制”被说成是最伟大的思想，是邓小平的首创，实际上这是我们的国糟，一点都不伟大，我们到处都在玩两制啊，城市和农村一分为二，不是一国两制吗？开放区和非开放区也是一国两制，港澳与大陆的两制只是简单的顺延而已，生在大陆的傻子都能想到这个招数。

在贫穷落后的地区，见人时脸上搽着粉，点着胭脂，不见人时土坷拉擦屁股，一个身体还两种待遇呢，所以一国两制是非常普通的主意，一点都不伟大。

隔绝中外的第四块顽石是干扰外国电台。改革开放以前，境外一切电台，包括欧美、台湾、香港电台，都被称为“敌台”。大陆民众收听这些电台叫做“偷听敌台”，那是吓死人的罪名，跟“美蒋特务”差不多，一听就叫人心惊肉跳。改革开放后，不叫“偷听敌台”了，听者不被治罪了，但是采取技术干扰，让你听不清楚。

这种手段，越想越觉得下三烂，越想越觉得可恨。干扰外台的中国人，与收听外台的中国人，都是一样的人，都是成年人，都是具有法定行为主体能力的中国人，都是具有同等辨别是非能力的人，你有什么资格不许后者收听呢？你有什么权力决定他们哪些可以听、哪些不可以听？你比他们聪明吗？你智商更高吗？如果不是这样，那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你是统治者，他是被统治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什么关系？是不许他自由收听信息的关系吗？如果是这样的关系，你不是赤裸裸地把他们当成猪羊一样圈养吗？在你眼里他不就是猪羊供你吃肉、喝奶吗？如果是这样的关系，你不觉得你的这种统治是当今时代最野蛮、最落后、最愚昧的统治吗？而最野蛮、愚昧的统治术难道不该或主动抛弃，或必然被唾弃、被埋葬吗？

大陆信息猪圈隔绝中西的第五块顽石是卫星电视出现以后，大陆又开始封堵卫星电视。广电部曾有明文，四星级以上宾馆和司局级干

部才可以收看境外卫星电视。等级制真是深入骨髓！人人平等是全方位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息面前也是人人平等的。由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喊得太久，所以不会再制订一项按级别区别对待的法律，可是信息是个新玩意儿，一出手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就露出尾巴。

第六块顽石是国际互联网出现以後，又开始封堵互联网。封堵互联网之法具体有多少，我不确知，我知道的起码有四种：

一是屏蔽一些境外网站，让你上不去；

二是过滤掉一些关键词，让你看不到相关的信息；

三是随意关闭国内一些网站，像不久前的北京大学“一塌糊涂”网站；

四是随意干扰电子邮件通信的自由。在美国上网，什么网站都可以上去，什么关键词都会有回应，真是觉得“新旧社会两重天”。难道中国天生就这个德行吗？我不相信！她会变的，她一定要变，她一定得变。

2004年12月21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一条新闻，说“北大警告学生不得在境外网站论政治”。消息主要内容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名学生因为登录境外中文网站多次，遭学校网站老师警告。该名被警告的学生表示，他与北大负责网络管理的老师并不相识，但上月，该名老师竟然叫出他的名字，并警告他说，不要以为在互联网上说甚么都行，因为学生的一举一动都在学校监督之下；还明言，他不应该再关心政治，不要因为一时心血来潮而耽误了前程。该名被警告的学生起初并不为意，继续登录境外中文网站。结果，班上的老师直接在课堂

上点他的名。上周，他再次登陆境外中文网站，翌日，他被叫到学校教导处，被教导主任严重警告，并威胁他说，若再屡教不改，将开除其学籍。有关北京大学监控学生使用互联网的消息并不罕见。今年九月，北京大学学生讨论区‘一塌糊涂’，在发布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官员腐败情况的内部文章后，被校方勒令关闭。此事引起校内老师和学生的关注。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更发表致北大校长的公开信，指责校方的做法。不过，‘一塌糊涂’讨论区至今仍未解封。”

这条新闻说明，网络警察也是封堵互联网的重要手段。更可怕的是，每一个网络管理者，哪怕是大学里负责网络管理的老师，都自觉不自觉承担着网络警察的责任，成为看管和控制他人精神世界的黑手。
网络管理者全员成为网络警察，正如新闻从业者全员成为新闻检查者。

这个猪圈上的第七块顽石是海关，禁止携带他们认为敏感的任何出版物入关。这次从美国回来，入关的电子显示屏上出现的入关须知，我扫看一眼，没看仔细，好像没看到关于出版物的信息，最起码写得不突出。可是据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却是你携带什么出版物是他们最关心的。还是那句话，你有什么资格决定我能看什么书、不能看什么书呢？用马克思《评普鲁士书报检查令》里的话，除非证明你比我更聪明，更知道美丑香臭。试问你敢说这个话吗？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初成立时，台湾几位新闻传播学老教授给该院捐赠一批图书，揆诸常情，这该是一桩美谈吧？可是大陆这地方邪得很，美谈能自然变成丑谈，这批赠书在海关滞留了大半年一年的

样子，才到达目的地。人家好心好意捐书，你大陆把人家当贼，把人家当驴肝肺，不是成心伤人心吗？你海关一本一本翻，能翻出什么大毒草来？也许根本就没翻，只是放在那里，以在海关滞留时间之长，表明他们审查之严。什么都与世界接轨，为什么不能在这方面接轨呢？

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天天挂在口头上，实际上各个职能部门时时处处都在糟践国家形象。

第八块大顽石，是严格限制订阅外报外刊。大学图书馆本是信息蕴藏量最丰富的地方，可是事实上那里的外报外刊极其有限。有心人不妨做个专题研究，看看大陆大学图书馆里订阅外报外刊的情况。即便是北京大学这座中国最好的大学里，它图书馆里订阅的外报外刊也少得可怜。北大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里，香港、台湾的刊物只有十来种，可能不足十种，《明报月刊》、《开放》都没有，《动向》之类就更不会有。我相信其他大中专学校里会更少，中专学校很可能就没有任何境外报刊。

大陆什么级别的单位能订什么级别的境外报刊，是有明确规定的，普通个人不能订阅外报外刊。1996年，我到《中国文化报》工作，报社阅览室里订有《明报月刊》。1997年，发现不订了。问为什么，管理员说，香港回归以后，订阅《明报月刊》的单位级别提高了。我们报社是司局级单位，现在不行了，必须部一级单位才可以。我继续问为什么，管理员说《明报月刊》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态度不能令大陆满意，所以提高了它的订阅级别。级别越高，订数越少，影响力越

小。我相信这个解释是确实的。一直到2001年我离开文化报，再没见过《明报月刊》。

大陆大学新闻专业的学生，无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几乎没有见过外国大报什么样。2004年上半年，有一次一位法国驻北京记者说，他们订阅的一些英文报纸，看过了可以寄给我一些，让学生们看看那些世界大报什么样。我说这是好事啊。收到两次之后，他们说再寄的报纸总是被退回，说查无此人（焦国标）。其他邮件都能正常收到啊，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事实。想来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邮政上的，每次一大包，送到我的单位，怪累人的；一个是意识形态上的，我给学生们的分看的外报可能惊动了某些人，索性指示邮局，查无此人，退回完事。第一种原因可能性极小，第二种原因也无从证实。无论是哪个原因，我都非常难过。本来是出於让学生们增长见识，新闻学院的学生嘛，外报都没见过，学什么新闻，到头来却落个“查无此人”。

第九块臭顽石，是国际长途费用奇高，以高额长途电话费阻断中西。中国打往美国的电话，费用极高，比美国打进来还高。我刚刚（2004年12月31日）咨询过，中国打往美国的电话是每六秒八角钱。可是美国打往中国的电话每分钟才几美分。打进打出是同一条线，而且中国人的收入与美国又不成比例，为什么会这么高？就纯粹的经济角度看，中国国际长途基本还是垄断行业，缺少竞争，价格居高不下也可以说得通。可是看了李希光先生的《新闻学核心》一书，对中国国际长途的高价现象我有新的领悟。该书中说，大约是上个世纪九十

年代，大陆还严格控制复印机的销售，不是谁都可以购买复印机的。
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扩大信息传播的速度啊！

看到这里，我特别心惊。一个社会怎么可以这样敌视信息传播？太可怕了。朝鲜的收音机只有一个频道，最近又有新规定，民众不准用手机了。去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古巴抓一个美国外交官，为什么？他卖收音机给古巴人。数百年前，谷登堡用活字印刷《圣经》，教会打压。更早几百年，基督教世界有人用阿拉伯生产的纸张替代羊皮纸抄写《圣经》，也被罗马教会限制。为什么？信息传播成本降低，信息垄断就不易了啊。大陆国际长途价格居高不下，是不是出於类似的目的呢？是不是几百年前欧洲天主教会拒绝活字印刷的借尸还魂呢？

除了以高额电话费阻断中外之外，大陆还设置另一个电话障碍阻断中外交往，就是境外来电不显示号码，或显示的号码经过了转换，你根本不可能根据境外来电显示的号码回拨。境外来电，在手机上通常显示为“受限制号码”，在座机上显示的是经过转换的号码，只可以境外打进来，你想拨回去是不可能的。你们狗日的有什么权力限制这些号码？

第十块顽石，是出版社严格审查外版书。凡是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外文书籍，都是经过严格的意识形态把关的。有神论的书不翻译，不买马克思主义账的书不翻译，反共产主义的书不翻译，暴露大陆问题和罪恶的书不翻译，肯定西方文明的书不翻译，诸如此类。只有用

人类全部的知识财富丰富自己，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是大陆官方挂在口头的一句话。可是我们都知道，《圣经》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然而直到今天，大陆没有哪家出版社出版过《圣经》。由此足见大陆官方意识形态挑食挑到什么程度，足见他们说得多动听、多么通情达理，而实际上又是多么愚昧昏庸，不可救药。大陆思想文化界弱不禁风，近亲结婚，兄弟姐妹私通，生一个是个怪胎，再生一个是白痴，谬种流传，品质退化，永远不可能生出周周正正、在国际学术界拿得出门的后代。

即便是严谨的西方学术著作，翻译过来时也要在前言里交代一句，要读者有批判地阅读云云。我手头就有例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每一本书前面都有一页《出版说明》。其中写道：“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十年后商务印书馆的译着仍然有类似的话。1993年第一版，2001年第三次印刷的《武士道》，日本新渡户稻造着，张俊彦译。在汉译序言中有一段话：“由于本书是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写出来的，其中有些观点不免有过时之感，同时，由于作者本人的立场所限，有些观点也很值得商榷。这是希望读者们注意的。”出版者或翻译者一定要这样在序言里“打预防针”或“喷药消毒”的。或者也许他们根本不认为有病、有毒，可也要这样走一下形式，表一个态，这出版和翻译才安全。

实际上这样的交代难道不是画蛇添足吗？“时宜”、“过时”、“立场”、“商榷”之类说辞，不是自然而然的吗？谁和谁能完全一致呢？此刻的你和彼时的你也不会完全一致。再说，过时不过时，立场不立场，商榷不商榷，糟粕不糟粕，都是读者的事，与你出版者和翻译者何干？用得着你们提醒吗？《武士道》原以英文写成，1899年在美国出版。我手头这本汉译本系由日文翻译而来，日译序言里就没有这些浮赘悬疣。出版者和翻译的职责就是译好、出好书，至於读者怎么看作者的观点，那不是你们的事，不劳你们费词。可是长期以来，大陆的出版者和翻译者就是这么咸吃萝卜淡操心，不厌其烦，一定要跳出来提醒读者，告戒读者。否则他们就可能自认为没有立场，或被书籍检查官认为立场有问题，就可能惹麻烦。这是企图控制读者思想的一种体现，就像人类尾骨是猴子时代的遗迹。

图书进口也严把意识形态关，有神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不拍大陆政治马屁的书，肯定不会进口。

第十一块顽石，是不许中国公民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这条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完全是非理性的传统在作怪。国家领导人可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官员有时也可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普通人却不行，除非那外国记者采访的是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可惜外国媒体不是大陆的机关报，他们不会完全按你的笛音跳舞，外国记者向大陆民众采访的内容通常是负面信息，因而外国记者一接触中国普通民众，官方就本能地竖起耳朵，扎煞着手，准备打压、封口和事后算帐。久而久之，中国民众几乎不敢接触外国记者，避之如瘟神。不仅是中国普通民众，

即便是高级知识分子也都闻外国记者电话而悚然，不敢轻易接受采访。据一位法国驻京记者称，中央党校外事办甚至规定该校学者一律不得自行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外国记者是魔鬼，他能把你们的人活剥了？位美国之音驻香港的一位记者告诉我，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不敢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任何话题的采访，说这是清华大学的规定。我为清华大学感到悲哀。

第十二块顽石，动辄以泄露国家机密或煽动颠覆政府的罪名，传唤和抓捕自由写作、自由表达的中国作家和记者。最近的例子如《纽约时报》的中国雇员赵岩被抓，自由作家刘晓波、余杰被传唤。

上述十几块臭石头构成中国信息猪圈的外郭，把中国与外国隔绝起来。下面谈中国信息猪圈的内城，其功能是把中国民众与中国媒体隔绝开来。这个信息猪圈的内城最宏观的层面是由两块臭石头构成的，即国有和党控。中国所有的新闻出版机构，都是国有的。三大传统媒体，报刊、电视和广播，都是国有的，出版社也都是国有的。第四媒体国际互联网有非国有的网站，但是没有采访新闻的权力，还不算是真正的新闻媒体。2004年12月，《新京报》刊载一条消息，说中国将出现一个民营电视台神州电视台，挑战中央电视台独一的局面。中国广播电视局马上出来辟谣，说在中国，民间开办电视台是非法的。官方拥有一切新闻出版机构，也就封锁着与官方观点不一致的一切信息的出口。

从人事权上，任何媒体的社长和总编，都必须是共产党员，都必须经过宣传部和组织部考察和任命。中央级媒体的社长和总编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组织部考察任命，各部委和各地方的媒体，其社长和总编辑由各部委和各地方党委的宣传部和组织部考察任命。西方记者不理解为什么中宣部对新闻机构的控制那么有效，金正日来华，中宣部说不许发消息，全中国没一家媒体敢发一个字；等金回国了，中宣部说可以发消息了，於是铺天盖地中国媒体都报道说金正日前两天来了。来时不报，走了疯报，这是新闻的品格吗？与其後报，不如根本不报。还有汉源事件，境外媒体都在热报，可是中国大陆的媒体真叫滴水不漏，没一家吭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说，这很简单，因为中国新闻媒体的领导人都是一级政府官员，你说政府官员的行为特徵是什么？当然是惟长官的意志是听了。他们问，有时中国的媒体为什么也会做一些出格的报道呢？我说那是因为长官的手还没有伸到那出格的地方，即便长官一手遮天，有时还有指头缝漏风。有一点确定无疑，只要宣传部明确说某事不许报道，就绝对不会有媒体去碰它，那是绝对令行禁止、其应如响的。所以你要问中国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新闻自由的发展程度如何，我说，就中宣部命令不折不扣的权威性而言，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与文革，与战争年代，与军事战场上一样，没有自由。

隔绝中外的第十三块臭石头是中国外交部比中宣部的“觉悟”还高，意识形态甚至比中宣部还要敏感，它严格审查境外学者的学术观点和研究领域，凡是它认为对中国“不友好”的学者，拒绝签证入境。著名的中国文革研究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先生即属此列。另有

一位美国教授，名字忘记了，2000年北京大学新闻学院邀请其来中国参加该院的成立庆典。报告打到外交部，经过外交部“政审”，发现该教授“对我不友好”，不予批准。不仅如此，外交部认为邀请这样的学者来中国，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就因为这个原因，或者这是重要原因之一，北大新闻学院被推迟一年成立，成立时再不敢邀请外国学者。后来据说这是一个冤案，是一个误会，该美国教授实际上并不像外交部掌握的那么“坏”。2004年12月我到纽约时报社拜访该报著名专栏作家、中国问题专家吉思道先生，他告诉我使馆拒绝了他的签证申请，因为他写的专栏文章“有问题”。

我发现中国大陆的外交官，远不如清末的外交官文明。那时的外交官写过不少文章，向国内介绍驻在国的长处，鼓吹借鉴西方文明；“新中国”的外交官谁写过这样的文章？起码我几乎没看到过。他们是当今中国被过分敏感的、畸形的政治意识形态熏染最重的中国职业人群体。外交部本应是最开明的部，外交人员本应是最应具有“向洋看世界”心态的人士，可是在中国则相反，他们比中宣部还更“讲政治”，更抱残守缺、闭目塞听。

隔绝中外的第十四块臭石头是不许海外流亡者回家，有些流亡者国内的亲人也不许去海外探亲。这些流亡者据我在美国的感受，实际上是两个群体：一个是民运人士，一个是法轮功练习者。他们申请回国，或者不被允许，或者入关就被抓。

二、砌筑中国信息猪圈内城的九块臭石头

上述是构成中国信息猪圈外郭的十四块臭石头，下面介绍构成中国大陆信息猪圈内城的臭石头。构成信息猪圈内城的臭石头太多，方方面面，难以尽述，捡比较突出的说吧。

第一块臭石头是一旦发生负面新闻事件，从警察系统到各行政部门立即行动起来，封锁事件发生地，把新闻发生地与各地赶来采集新闻的记者们隔绝开来。记者到不了事发现场，采访不了位于前列的当事人，就只能放弃这条新闻。据一位法国记者朋友说，汉源事件时，他以访友的身份前往汉源。当地武警提着冲锋枪围追堵截他，把他扣在汉源县公安局一个晚上。莫说是外国记者，就是中央电视台记者，遭遇地方官方封锁消息的经历也是家常便饭。重庆万州事件、四川汉源事件，官方还采用阻断电话、手机、手机短信等方式，构筑信息围城。

第二块臭石头是新华社通稿。一旦发生重大新闻或敏感新闻，全国各媒体一律采用新华社通稿，各媒体不得使用自己记者采写的新闻稿。新华社一家捏造新闻或扭曲新闻，全国媒体都要跟着捏造和歪曲。新华社一家打定主意欺骗全世界，全中国就没有一家媒体能做到真实。乍看不是封锁，实际就是封锁。那么新华社捏造和歪曲新闻的概率有多少？看看新华社的历史就知道了。大跃进放卫星时新华社做了什么？“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千万中国农民时，新华社发过一条饿死人的新闻吗？新华社发布过一张饿死人的新闻图片吗？远的不说，说近的，法轮功练习者遭受的酷刑，冬天冻死在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的上

访者，新华社发过一篇消息或一张新闻图片吗？这样的新闻通讯社，我呸！

第三块臭石头，出版社严格审查书稿。大陆一本书能不能出版，第一重要的是政治上正确不正确，只要政治上没问题，无论什么烂脏玩意儿，总能找到出版社。可是如果你政治上“有问题”，不管你的著作学术含量多高，思想含量多大，也不管你怎样努力，磨破嘴，跑断腿，都不会有出版社敢接你的书。政治上正确不正确也没有一定标准，完全是出版社编辑根据各自的感觉。我在大陆出版社出版了五本言论集，没一本是我的“亲儿子”，想起来本本让我恶心。为什么？出版社编辑把你的书稿抽得、删得面目全非。否则不出。结果是书虽然出来了，可那书被强奸凌迟得连你自己也不疼爱它了。解放军後勤部一位朋友，工作之余写作言论文章，一部25万字的书稿，出版社给他又抽又删，最後只剩下十二万字。对这样的出版机构，他感到愤怒和绝望。

或者即便是你的著作政治上没问题，但是只要你这个人因某篇文章被中宣部盯上了，划入另册，就休想再出版你的著作。笔者本人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2004年初我有两本书被天津和上海两家出版社相中，都签了出版合同，可是因为《讨伐中宣部》，出版社都毁约了。这两本书都没有任何政治问题，一本是《回望农民》，是我近年写的为农民吆喝的言论集，几乎都在大陆报刊上发表过，另一本是关于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汤若望的影视剧本。另有我的两本言论集，也是原定2004年出版，全都泡汤了。

第四块臭石头，大陆出版机构还有严格限制书号一说。新闻出版署统一掌管每一家出版社的出书数量，假如2005年给你这家出版社五十个书号，一个号一本书，出不够五十本书可以，出五十一本却决不可以。过去给你出版社五十个书号，具体出什么书，出版社有一定自主权；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五十本是什么书，书名和大致内容要上报新闻出版署，经其审查同意之後，方可出版。这意味着出版审查、信息控制更紧了。据2005年《新京报》丁东先生的文章《给优秀图书弹性的出口》，“不少出版社一到年底就为书号不够用发愁，有些书因为没书号只好推迟出版，有的出版社乾脆对编辑实行经济责任制，要求用书号创收，一些读者面较窄、专业性较强的书稿，学术价值再高出版社也不太愿意出，除非交很高的赞助费……虽然明令禁止不许买卖书号，但出版社和民营书商的合作一直存在”。

有学术价值而没读者的书，尚可以交赞助费出版，可是有思想价值且肯定也有读者的书，却是无论交多少赞助费也没出版社敢接你的活儿。书号本就是一个数字，而天下的数字是无限的，因而书号本来也是无限的，可是在大陆图书出版界，天地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数字也被用来限制和钳制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处於前锋地位的出版物，真是天理不容。

第五块臭石头，大陆各单位的档案资料高度保密，许许多多的历史真相被官方有意遮盖。而且从图书馆到各单位的档案室，对于查阅档案资料的人的身份和资格都有严格的要求。如果你不是专业研究者，

就很难被提供查阅有关档案资料的方便；或者你不到某一专业职称级别，就享受不到查阅某一类图书资料或档案资料的权利，等等。位於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就严格限制北京以外的读者的查阅范围，对低学历的读者也有许多歧视性条款。这个号称国家图书馆的地方，历来以敲诈勒索的手段盘剥读者而知名，它的复印费一页五块，而市面上只有几分钱。

第六块大石头，大陆各图书馆负责图书采购的人士，也都有值得信赖的政治敏感性。2005年1月3日《新京报》刊载徐友渔先生的文章《国图软件比硬件重要》，“我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图书馆，和国图、北大图书馆一道被称为北京社会科学图书馆的三大重镇，但我几年来研究西方政治哲学，几乎全部英文书不能借到，全靠我自己在国外购买。举两个例子：罗尔斯的原着，我在本单位一本也没有借到过，马克斯·韦伯再经典不过了，现在每个大书店都摆着中译本，但我院图书馆大半没有；相反，唐浩明的《曾国藩》，以及许多内地作家的小说，除了内地版，还有港台版。我们知道，港台书贵得多，为什么要这样使用采购资金呢？”西方思想政治经典著作，能少办就少办，省下钱来正好可以多多采办垃圾出版物。在一个谈正义就是罪过的时代，罗尔斯的《正义论》之类那就是教唆犯罪，怎么可以采办这样的出版物。

第七块臭石头，中宣部明确限制某些题材，这些领域不能碰。比如影视制作单位不得摄制西洋传教士题材的作品。汤若望是明末清初非常伟大的一位来华传教士，我偶然读到他的传记，被他一生的传奇

经历所感动，决定将其生平写成影视剧本，摄成影视剧，以传扬其美名。可是写好才发现，这样的题材犯忌。拍摄影视作品不行，出书是可以的；可是因我写了《讨伐中宣部》，我出书是不可以的。书不犯忌，可作者又犯忌。

媒体对一些历史信息的报道也受中宣部严格控制，哪些历史问题不能提，哪些历史旧帐媒体不能算，中宣部都有要求。即便是学者研究，也受到限制。比如你的研究课题如果涉及敏感的历史问题，你就接触不到第一手的资料，你申请不来研究经费，你的研究成果出版不了，等等，造成事实上的信息封锁。学术研究都要以马克思主义做指导，科研项目必须政治正确，而且事实上分成三六九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是特级学术研究项目，科研经费多多。在这些特级课题里，你越是在什么也没有的地方煞有介事地弄出些似是而非的学问，你就越受青睐，越享实惠。一些学术领域禁止“生育”，另一些学术领域则实行“生育刺激”，人为地制造学术生态的失衡。

第八块臭石头，用专家学者误导公衆。大陆信息控制越来越专业化，他们深谙传播学上的二级传播理论，即舆论领袖的导向作用，一有大事发生，媒体即组织专家、学者点评。专家点评当然是无辜的，有幸的是只许用一个声音点评。有立场也是无辜，有幸的是只能你有立场，别人不能有立场。这样做的结果是封锁了不同的信息，钳制了受衆的思想。在许多国内国际重大问题上，中国受衆几乎成为白痴甚至罪人，像为恐怖主义叫好，为9?11拍手称快，就是证据。

第九块臭石头，大学本来是自由论学的地方，可是大陆各大学的学术活动也都被严格控制，必须层层打报告。学生自己组织小范围的学术探讨，也要团委、党委地层层审批。在美国的几所大学巡回演讲时，我问他们这些演讲是否也要审批。他们告诉我，根本不用任何审批，都是学生一张罗，找个场地，发个消息，然後演讲者准时一来，就是一次演讲。可是在中国大学里，这种做法是“非法的”，事後会受到指责和批评。

费希特说：“任何把自己看成是别人的主人的人，他自己就是奴隶。即便他并非总是果真如此，他也毕竟确实具有奴隶的灵魂，并且在首先遇到奴役他的强者面前，他会卑躬屈膝。”我要说，任何把民衆当成牲畜一样企图永远愚弄他们的人，他自己就是牲畜。信息猪圈的本质就是把人当成牲畜，而殊不知把自己的同类、同胞当成牲畜的人，自己也已墮落为牲畜。“谁受到欺骗，谁就是被当作单纯的手段。”“人可以利用非理性的东西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但是却不可利用理性生物（人）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他甚至不可利用理性生物作为达到理性生物自身目的的手段；他不可像对待无机物质或动物那样，对他们施加影响，以致不顾他们的自由，而只是利用他们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不可能使任何一个理性生物违背自己的意志，而成为有美德的、聪明的或幸福的。”现在人类最前沿的文明甚至已经把动物都当成亲人看待，而你们却把作为理性生物的国民当成食物链下端，确保他们永远愚昧无知下去。然而“人类可以放弃一切，...

...可以剥夺人类的一切，只是无法剥夺人类完善的可能性”。企图剥夺人类完善的可能性的人，将因此得到报应。

费希特还对当时的学者放弃自己的使命表示愤怒和谴责。他说他们“既不重视正义，也不重视非正义，既不重视神圣的东西，也不重视渎神的东西……（他们）丧失了对於正义和非正义的任何理解，...把贤明变成谋取自己利益的狡计，把职责变成他们满足他们贪婪的手段，……（他们）在屈辱中寻找自己的高尚，在羞耻中寻找自己的光荣，……本来应当成为民族的教师和教养者的人们，沦为甘愿败坏自己的奴隶，本来应当对於自己的时代发出明智和严肃的声音的人们，谨小慎微地听命於最专断的愚蠢和最专断的恶行所发生的声音……他们丧失了最後一点预感能力。”“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那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费希特在《向欧洲君主索回他们迄今压制的思想自由》一文里写道：“君主，你决没有任何权力压制我们的思想自由！”是的，建造中国大陆信息猪圈的人们，你们也同样没有权力！

（编注：此文系作者根据其2004年12月初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和洛杉矶分校的讲演内容扩充而成。）

中国开放报禁的三种途径

焦国标

日前有美国之音记者打来越洋电话，问以我之见，中国大陆报禁何时开。台湾开放报禁的前例给中国人无限希望，眼巴巴都盼着那一天早些到来。我答道，我掐算不出来具体何时开，但肯定要开，而且我对开禁方式的具体途径有所思考。

第一种开禁途径，某年月日，全国一起彻底开禁。第二种开禁途径，头一年先几个省一起彻底开禁，比如东北三省，次年再几个省，比如西北数省，三五年内全国各地报禁全部放开。经济放开，始於东南，我主张这次开放报禁的甘露别再人为地後降在西部地区的人们头上。这里所谓的彻底开禁，是指像开办普通的公司一样，只要符合某一基本标准，无论是张三，还是李四，谁都可以注册办报（电视台、出版社等），不要留下任何特许制的痕迹。

第三种开禁途径是，像国家订立五年计划一样，制定出一个开放报禁的五年计划。比如在这五年里，每年可以允许各省创办五家纯私营报纸、五家纯私营电视台、五家纯私营广播电台、五家纯私营的新闻综合类网站和五家纯私营的出版社。如此到第五年，新闻业准入实现“零门槛”，谁爱办谁办，就像小商小贩登记注册公司一样轻而易举，完全达到欧美、港台新闻自由的水准。

就笔者个人的倾向，第二种开禁方式最优。既可以把开放报禁的震荡减至最低，又可以最大限度地屏蔽权力寻租。第一种方式，全国一起彻底开禁，固然可以避免权力寻租现象，可是全国新闻出版界一时可能乱成一窝蜂。第三种方式必然造成权力寻租。假定今年允许河南省开办五家私营报纸，标准一定，而达到这个标准的却决不可能就这么五家，那么问题就出现了：谁可以进入今年这五家？谁不得进入今年这五家？大家必有一拼。怎么拼？拼什么？很难逃出拼关系、拼钱的窠臼。鉴于目前有钱就有关系的现实，最后肯定是谁敢下血本送钱谁进入。

顺便说，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之先生就曾企图向蒋介石政府推举第二种方式的思路。当时共产主义的理念正如地火运行，胡适认为，拨出东北三省，让共产党搞共产主义去。搞成了，全国推广；搞砸了，不待党国兴兵围剿，共产党就自动偃旗息鼓。可惜胡博士胆子太小，文章写成，不敢发表，也不敢上书，压在箱底几十年，这么好的主意白白浪费掉了。不过话说过来，即便胡敢发表，敢上书，蒋也未必会采纳，甚至决不可能采纳。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统治者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德行，灭亡的头天晚上，还认为自己的天下金字塔般坚固，莫予撼也。

大陆有关方面多年来一直在喊、在搞所谓的新闻改革。实际上不是叶公好龙，便是大言欺世。之所以如此，除了现存新闻体制的受益人宁与国家同沉，也决不愿放弃既得权益的原因之外，更主要的原因

是认识上存在误区。这误区是什么？就是“党抓新闻不能丢”，而所谓“党抓新闻不能丢”又混同於“宣传部抓新闻不能丢”。总之无论怎么改，万变不离其宗的一条是新闻出版必须听宣传部的。这个认识误区对於开放大陆报禁，在实际上具有致命性，在理念上是个天大的误区。

尝试论之。第一，宣传部抓新闻出版都抓五十多年了，它抓出来几家成功的新闻媒体和出版社？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出版事业建立了多少丰功伟绩？尽管它总在摩拳擦掌、赌咒发誓，要培养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和名出版家，可是半个多世纪里它究竟培养出来几粒这样的人物？所谓新闻改革，改的就是中宣部抓新闻。如果中宣部抓新闻不能丢，还改革什么？

不说别的指标，单说我们的出版业，这五十多年里我们中国大陆的学术著作被翻译成外文的有几本？简直少得可怜。据笔者手头的一本《汉籍外译史》，近半个多世纪里，被翻译成外文的人文社科类学术著作，不出十本！其中有几本还是冷战时期翻成俄文的，其学术含量可想而知。以新闻学科为例，被翻译成外文的新闻学著作，五十多年里，到目前为止，一本都没有。我们有13亿人啊，我们占世界四、五分之一呀，难道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在漫长的半个多世纪里“对人类做出的较大贡献”吗？岂止是脸红，简直不配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简直是罪孽。

试问这个罪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长期实行和目前仍然死抱不放的“宣传部抓新闻不能丢”这个一切新闻改革必须遵行的所谓前提造

成的。五十多年里宣传部抓新闻出版，真可谓伐南山之竹，写不尽其失；倾东海之波，冲不完其罪。宣传部早该撤掉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了。

第二，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的新闻出版机构，都必然要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试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是按谁的意志制定的？不屑说，当然是按中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意志制定的。这不就齐了！任何新闻出版机构，无论是党政机关报还是纯私营媒体，只要按照中国现行的宪法和法律运作，就等於党和政府的意志实现了。党和政府的意志实现了，就等於“党抓新闻”了，何必还硬要在新闻出版业与中国现行诸法律之间加进一个全权的宣传部？

简言之，新闻出版机构只要依法运作，就等於“党抓新闻”。在新闻出版业、宣传部和法律三者组成的这个三明治式的结构中，试问宣传部除了给宪法和法律打折扣，除了在这折扣中间夹带宣传部长及其部员们的个人意志（而有别於宪法和法律的意志）以谋取私利之外，它究竟还能起到别的什么作用？

欧洲中世纪的神学家常常表达这样一个的逻辑：世间百书，无非两种，一种是与《圣经》相合的，一种是与《圣经》相悖的。如果与《圣经》相合，一本《圣经》足矣，其他无须存在，纯属多余；如果与《圣经》相悖，那它们根本就是错的，更无存在之理，更是一本《圣经》足矣。套用此逻辑：如果新闻出版机构的产品有问题，宪法

和法律追究足矣，何必再听宣传部喝？中宣部的指令与宪法、法律的关系无非两种，一是相合，一是相背。如果与现行法律相合，宣传部就是多余的；如果与现行法律相悖，宣传部就是错误的。无论合与悖，宣传部皆无存在之理。说俗俚一点，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运作，听宪法和法律的足够了，根本无须宣传部中间再插一杠子。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这句话在中国大陆的任何一个改革中，都会放出刺眼的毫光，犹如迎日不可逼视。既然不可逼视，就糊里糊涂把“党是领导一切的”搞成实际上的“书记是领导一切的”，新闻出版界则弄成是中宣部是领导一切的。实际上，法是执政党意志的产物，法领导一切，就等於党领导一切。如果“书记领导一切”，书记必然夹带自己的私货，必然扭曲法的笔直，从而侵害执政党的意志。执政党欲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美意良政，只有通过法律，而不是通过书记。通过书记，实现的是书记的意志，不是执政党的意志。同理，新闻出版之运作，通过宣传部，实现的就只能是宣传部的意志，而不是法的意志。当然，法与书记、与宣传部，未必总是矛盾的，可是一百次里矛盾一家夥就够中国受了，哪用处处都矛盾啊。实际上矛盾率哪止1%呀，白分之九十九都与法矛盾。中国怎么能受的了，怎么能不乱，怎么能不潜伏危机。

如果报禁放开，让新闻媒体甩开膀子自由行使其舆论监督之职，一份报纸比一千间法庭更能保证社会公正，一张自由的《人民日报》比一千个中纪委反腐效果还要好，一个自由的中央电视台，检视腐恶的功能远远超过一万个国家审计署。

美国归来答客难

——焦国标访美期间在华盛顿演讲

焦国标

2004年11月4日到12月4日，整整一个月，我没有在中国领土上。在哪里呢？在美国领土上和太平洋上空的航线上。透过飞机的舷窗，好几个小时我看到的都是无际的冰原。航班电视屏幕上的飞行路径示意图显示，飞机从底特律起飞，没有沿纬线西飞，而是一直向西北飞去，也许最北已经过了白令海峡了。如果过白令海峡，那就到北冰洋面了。无论太平洋还是北冰洋，都免费，不像中国大陆高速公路上设有那么多收费站，因而所经之空都是什么地方是不需要太计较的了。需要略做计较的是回国后遭遇的一些小小误解和猜测。

比如有朋友就半真半假地问，说我近来是不是负有某种使命，接受某人指使，不然怎么这么固执己见呢？很有靠山，很有底气，有恃无恐的样子。我听了真是哭笑不得。人做什么事难道一定得受谁指使、受谁托付才肯做吗？那试问甘地做事是受谁的托付？马丁路德金又是受谁的指示呢？马克思写资本论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又是哪来的底气？耶稣上十字架又有谁给他做靠山？康德说他有两个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我受心中的道德律指使，这理由难道不够吗？这

动力难道还不足吗？其实人们似乎只看到了我的有恃，没有看到我的有恐。恐是有的，我在克服。

有朋友半真半假地说我有借外国、借美国以自重之嫌疑。我说你这是本末倒置。我算哪根葱啊？美国是谁想借就借的吗？卡斯特罗离美国那么近，他借上了吗？不是我借美国以自重，是我自己心悦诚服重美国。美国就应该被重啊，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应该被重，当今世界各国都应该像美国学习，学习他民主自由的精神，学习他始终高举人权大旗的精神，学习他不仅不逼迫自己的人民流亡海外，而且还接纳世界各国的政治流亡者，哪怕因此影响几十亿、几百亿生意定单也在所不惜的精神。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全心全意为人类文明服务的精神，这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不上十字架谁上十字架的甘愿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是什么境界？这是光风霁月、行端表正的境界。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美国的这种精神；剩下硕果仅存的四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古巴、越南和北朝鲜，更应该低首下心，甘当小学生地追捕观摩步趋美国的这种境界。

还有朋友说我在海外上发言是用外国媒体搞狐假虎威。这么说，是不是海外媒体，全世界的媒体包括美国媒体，《纽约时报》、美国之音、路透社、美联社、《读卖新闻》之类，也全都像中国大陆媒体一样，严受中宣部节制，说焦国标的名字不能出现就出现不了，说焦国标的书不能出就出不来，说焦国标的演讲得取消就不敢不取消，说焦国标的课停了就不敢不停，立竿见影，其应如响，这才过瘾，这才不是用海外媒体搞狐假虎威？

中国人只知道知情权的概念，不知道还有接近权。什么是接近权？民衆有通过媒体获得信息或得到帮助的权利。换言之，媒体是民衆人人可以接近、可以依靠的，不是只能你接近、你依靠，别人不得接近、不得依靠。全世界的媒体，隶属各家，民衆接近不了这个接近那个，这个依靠不了依靠那个，就像一个老人有许多儿子，哪个孝顺我靠哪个，这有什么错吗？你要想把人干死，人家就不能找水喝，这是什么逻辑？太霸道了吧？在我眼里，没有国与国之分，只有新闻自由理想和强权专制的现实之别，这正如美国开国元勋的意思，自由的媒体比现实的政府更合法，更令人倾心。我也这么看。

还有朋友说我在美国接触的一些媒体不适当，比如自由亚洲电台是“敌对媒体”，《大纪元》是法轮功背景，等等。我是新闻学博士，也许在这个问题上我更专业。在经典新闻学观念里，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是平等的，例外的古今中外恐怕只有鼓吹法西斯的媒体和鼓吹恐怖主义的媒体这两家。惟独这两家不得视为平等，不得享受自由。显然上述二媒体不属此列。在我这个专业人士眼里，自由亚洲电台、《大纪元》、新唐人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台湾中央社、日本《读卖新闻》、《纽约时报》、BBC、CNN、美国之音、法国《费加罗报》、新华社，等等等等，一律都是平等的，没什么国家级媒体和省部级媒体之分，也没有处级和尚与科级和尚之别。谁都有权利办媒体，你的权利与我的权利一般大；谁都应该有喉舌，你可以有喉舌，别人也有喉舌不是大逆不道，而是正常行为；喉舌与喉舌是相等的，除非是希特勒的喉舌，除非本拉登的喉舌，此外没有别的喉舌

被划入人类的另册。不是喉舌论不对，是别人不能有喉舌不对；不是新闻没有立场不对，是只能你有立场，别人不能有另外的立场不对。

有朋友说你怎么一不留神滑到那个圈子里了。说实在的，我都不知道我滑入哪个圈子里了。我只知道我没任何圈子，孤家寡人，单打独斗。圈子是存在的，我自己却没有任何圈子。没圈子并不意味着我比谁更高尚，圈子无辜，有圈子与无圈子一样光荣，我不标榜遗世独立。中国人是一个一个鸡蛋，装在同一个篮子里，我只想做锤子，一个一个鸡蛋全砸烂，大家流淌到一起。或者我做不到锤子，就做一根竹签子，把鸡蛋一个一个全扎烂，大家彼此流淌出来多少是多少。或者我希望自己起到半个糖葫芦签子的作用，把一个个山里红扎穿，但又不把他们硬串在一起，给大家通一下气，透一下光。这就是我自己定位的角色，这就是我哪儿都去，任人都见的动机。我说我在美国是贯彻“三个一切”的精神，吃一切请，见一切人，说一切话。见一切人留有遗憾，我想见我们的使领馆官员，早就放出风来，没见任何响应，可能是由于我什么级别都不到，什么角色都不是吧。

有朋友说，你是一个老师，教好你的书就是了，管那么多闲事、说那么多闲话干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呼唤新闻自由，争取言论自由，怎么能是闲事闲话？再说，我一个新闻学教授（鉴于副乡长也可以称乡长，那副教授也可以称教授），一个新闻学博士，不关心新闻自由关心什么？一个知识分子，不说话要你干吗？杀肉我们出肉率赶不上猪，看家护院我们不如狗，纳税人养我们干吗呀？知识分子的本职工作就是说话，就像工人做工、农民种地一样。也的确有许多新

闻学教授、新闻学博士，不谈新闻自由，不争言论自由。说实话，我看不惯他们。顶着新闻学教授、新闻学博士的头衔，吃着新闻学的饭，不为新闻自由鼓与呼，吃饭你不牙碜吗？拿着纳税人的钱，自己苟安旦夕，歌舞湖山，东研西讨，煞有介事，招摇撞骗，正事不干，你不脸红吗？你心里落忍吗？话说过来，那是人家的选择，共和国公民有选择自己兴奋点的自由。选择谈、选择争，与选择不谈、不争，都一样合法，何必独责我是管闲事、说闲话呢？

有朋友接着说，那就不让你做新闻学教授，让你去搞搞文献、整整古籍，你不是古代汉语硕士吗？专业也对口啊。让我去搞甲骨文研究也不影响我关心新闻自由，让我去搞考古发掘也不耽误我争取言论自由——不是还有业余时间吗？鲁迅说，他是把别人喝咖啡聊天的时间都用于写作，才有这样的丰产。时间像海绵，余地空间总是有的。我要关心新闻自由，我要争取言论自由，直到我自己没有兴趣为止，别的因素是终止不了。

有朋友说了，那就把你从北大踢出去，当不了教授，做不成研究，看你还关心不关心、争取不争取。那我就到别的地方去关心，去争取。我说了，直到我自己不爱关心、不爱争取了为止。干吗一定要给别人的自由意志过不去呢？我现在是北大副教授，万一哪天被开除出北大了，我就自封北大正教授。正教授之不足，就加封北大终身教授；终身教授之不足，就再加封“北京大学百代教授”衔。而且要追封三代，已去世的文盲祖父和已去世的完小毕业的父亲，我要把他们都追封为北大教授。不仅追封，而且还要传子传孙，世袭罔替，无论将来我的

子孙成不成才，鷄鸣狗盗之徒也好，国贼禄蠹之辈也罢，皆袭北大教授衔。

有朋友说，你为什么这么糟蹋北京大学？你与北大有仇啊？北大待你不薄啊。别人可以糟蹋北京大学，我为什么就不能糟蹋？别人透支北大声誉，我为什么不能透支？别人绑架、要挟北京大学，我为什么不能？北大的脸，和尚可以捏，我阿 Q 怎么就不可以捏？

有朋友说，当初我看你写《讨伐中宣部》，写《致美国兵》，就心术不正，纯粹是为了讨好美国，为了去美国，这回得到验证了吧。且不说这次去美国与美国压根没关系，我只请问您一句：当初约翰弥尔顿写《论出版自由》，他是想去哪国？马克思写《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是不是为了讨好英国？康有为写《孔子改制考》，梁启超写《变法通议》，是不是为了想去日本？你们为什么就不相信人还是可以发自天良做些事的呢？你们为什么就不能相信人自身的道德律令也可以是，而且应该是，最原初的行为动力呢？

有朋友说，你不是搞政治的料，你什么党也不在，何必趟这混水？我这哪是搞政治啊。再说，人类既然有政治，就得有人搞，搞政治不丢人。特别是搞现代民主政治，更不丢人，那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民主国家，大选时人人投票，是不是全民都去搞政治了？只有咱中国才有这样的观念：好人、老实人，是不搞政治的。好铁不打钉，好人不搞政治，必然的结论就是，只有坏人才搞政治，那人想染指政治了，

就说明那人开始变坏了。无论搞政治的是好人坏人，我只坐而论道，只诉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别的与我无干。

最後算算这次去美国的经济账，因为有朋友问及是不是拿了人家的钱。第一，我没拿。第二，人家如果是指美国或其他什么人权机构，那钱是无比乾淨的，比中国贪官的黑钱伟大光荣正确得多，也比中国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科研经费用得更是地方。的确，此行美国我没花一分钱，去时带一百美元现金，回来还是一百元，没动。本来可以多换些美元带着，想想书上说有人兜里只揣几美元就敢在美国混，并混出个样子，我一百美元不是已经够多的了吗？所以就没有多换。後來在各机场，到处都有“两替所”，大约是外币兑换处的日本写法，就更不用担心了。

在美国一个月，不吃不住吗？吃，前面说了，吃一切请。其实请吃的并不多，我的脸不够大，主要是吃在几位朋友家。住，前三天会议期间住会，会议结束之後二十多天只住大约五晚旅馆，一晚在耶鲁，一晚在哈佛，一晚在华盛顿，由美国之音结帐，它做我一期访谈节目，要我从纽约到华盛顿来，付一晚的住宿费，还有两晚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付帐，另有两三个晚上是在火车和灰狗长途巴士上过的，其他晚住在朋友家。

有朋友要问了，你回国就不买些礼物吗？怎么去时一百元，回来还是一百元？是曾试图买些礼物，後又作罢。那是在哈佛大学，想买些小纪念品，一看產地，Made in China，算了，不买了。那你就没

带任何礼物回国吗？带了，都是别人送的。去自由亚洲电台参观，台长 Richard Richter 先生送一份小礼物，一方大理石镇纸和一只圆珠笔，圆珠笔装在一个像农家织布梭子那样的木盒子里。在《纽约时报》社，国际版编辑 Jeanne Moore 女士现买他们报社的纪念品送我，两支圆珠笔和四支铅笔，上面有印有纽约时报的花体报名。Jeanne Moore 女士是我们清华大学某教授的夫人，中国人的美国媳妇，我们可以叫她嫂子。那你自己就没买点什么礼物？买了，在东京机场换机时买了三盒日本点心，共花去 17 美金，然後凭虚御风，打道回国，三小时後降落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机场。

多说几句自由亚洲电台。给学生上新闻学课，教材里说，中国周边有许多外国电台对中国广播，自由亚洲电台是最丧心病狂的一个，立意就在颠覆中国政府，像当年自由欧洲电台专门颠覆苏联、东欧一样。我想既然到了华盛顿，就应该去看看这个鬼电台。不料不看则已，一看发现决非如此。他们的记者告诉我，他们在华盛顿的新闻圈子里也被同行侧目。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与美国政府关系近，被美国新闻人看不起，不像咱中国，越是机关报记者越光荣。可是他们记者自己，包括台里的领导，却特别谨遵新闻职业理念，要追求绝对的客观、真实、平衡。他们说，中国大陆把我们看成“敌对媒体”，那是大陆的一厢情愿。我们并不以大陆为敌，我们只奉行客观、真实、平衡原则，我们的使命是想方设法报道那些中国大陆听衆听不到的新闻。你们要给你们的人民蒙上眼睛，塞住耳朵，我们要给他们扯去蒙布，拔去耳塞，如此而已。如果我们这样做是对你们有伤害，只说明你们本来就太弱不禁风。

我听了他们如此的办台理念，非常感动。该台一位女记者，中国人，告诉我一个细节：有一天，她与两个大约来自中国大陆的参观者同乘电梯，其中一个说“这是一个宣传机构”，这位女记者脱口而出，纠正说：“不。这是媒体。”自由亚洲电台的同人们特别坚持自己的客观、真实、公正理念，他们说：“中国记者不懂客观，写稿子不是批评，就是表扬，就这两种口吻。”

继续算经济账。自费打过一次的士，在耶鲁大学附近，计价器显示是4.8美元。你知道，我只有一张一百元钞，没零钱。司机说找不开，竟没要钱走了。我曾经两次推迟归期，机票改期手续费一次一百元，共二百元，有朋友赞助了三百美金。剩下这一百元，在底特律打的花去三十六美元，从灰狗站打到机场。还余下六十四元，我揣下了。这出租车司机是个黑人，四十来岁，光棍儿一条，听说我是中国人，就说想娶个中国姑娘。我心说，你想得美，我可不大乐意。人家要真有这桃花运，我挡也挡不住。

来回程机票是七千人民币，会议主办者全报销，每人给了一千美金，略有赢余。另有一张一千美元的支票值得交代。朋友们帮我张罗一个奖学金项目，明年二月底可以得到最后消息。如果顺利通过，三月即可启动这个项目。有朋友们建议我在美等候，便馈赠这张千元支票，以维持项目启动以前这几个月的生活。我没在美等候，支票也带回来了。日前在中国银行办托收，发现支票上日期与名字写颠倒了，托收不了。托不了算了，方便时退回去就是了，本来是接济在美生活

的，人不在美，无需接济。另有两小笔帐目，共二十几美金，一是在华盛顿，从机场打的去美国之音，大约是十二美元；一是从华盛顿回到纽约，从机场到住地，打车大约花了十四美金。这两张出租车票留在美国之音，等报销。

在美国共得到两笔收入：一是初到纽约时，王若望先生的夫人，羊子女士，一定要给五十美元零花钱，说到纽约的後生小辈，来了她总给个零花钱。我拒绝不过，只能收下。谢谢！一是去美国之音做节目，答应要给一百五十美元劳务费，按他们的财务制度走，现在还没见到钱。还有一些事，与经济有关。听说我没课上了，有华侨说要为我募捐，还有的要送我二三百美金表示一下心意。我哈哈笑道：“哪至於呀。谢谢。”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们早把华侨的钱募个底儿掉，一百年过去了，人家华侨欠我们大陆乡亲哪？不要他们的钱。

有朋友说，你到处演讲，为人家站台，没给点报酬呀？我有点愤怒。演讲是演讲了，会议发言除外，计耶鲁法学院一次，哈佛法学院一次，华盛顿美国大学一次，纽约两次（皇后区法拉盛图书馆和全侨盟），旧金山两次（伯克利大学和一家会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次，共八次。所有演讲，预先没谈报酬，也没拿报酬。至於说站台，我为谁站台呀？能请动我为他站台的人还没出生呢，就像杨振宁教授在我去美国这么大（41岁）时他的“上帝的最後礼物”还没出生一样。我为我自己站台，我为我自己的眼睛、心灵站台，我站而无憾，我愿意。

上述一切的一切，本属私事，可以免谈的。可是这是一个无聊的时代，有道是不做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既然有许多朋友好奇，关心、谈论、猜测、旁敲侧击问这些事，我也就随手如实写来，出家人不打诳语，字字属实，敬请消遣。

（编注：此文写於2004年12月。作者从美国回中国之後，一些人对之产生了种种误解，认为其在美期间去了不该去的地方，见了不该见的人，拿了不该拿的钱，甚至怀疑作者是否加入某种组织，成了谁家的间谍。作者认为其访问美国的使命就是破冰趟浑水，从这些误解和怀疑中可以看出这冰该破，这水该趟；为打破传统需要付出代价。）

原载《二十一世纪中国丛书》

自由出版物的四项出版原则

——焦国标《讨伐中宣部》序

何家栋（北京）

我第一次接触国标的作品，始于他写的《北京的儿化韵》那篇文章，曾为他敏锐所折服，在短短的篇幅中，通过日常生活用语，把北京人那种“站在天安门，一览天下小”的皇权意识揭示的淋漓尽致，从此我对所谓“京味”什么的就深怀戒心。及至读到他在2004年初引发轰动的《讨伐中宣部》，更是受到强烈的震撼。虽然也有人批评它“激情有余，智性不足”，但我看重的不是它犀利的言辞和随手可以抓到的“小辫子”，而是它将中国人炼狱似的精神生活状态如此透彻地表现出来。现在他把与这篇文章相关的文字汇集为《中宣部和兼听权》，不仅为中国新闻史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中国文化恐怖档案库留下了一份现场记录。

中共十六大郑重地提出了“小康社会”和“政治文明”两个概念，前一个源于中国的传统思想，后一个则是通过日本辗转引入的西方概念，但两者都指向一个相同的目标：即建立文明社会。“文明”一词源自拉丁文“civili”，意指人的开化状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历史阶段。“civili”也有公民的意思，这就是说，比蒙昧和野蛮社会进步的文明社会应当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不是臣民社会，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在

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之间还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是政治因素，但同时又不是官方因素……这个具有公民头脑和市民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报刊自由。”“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

有人说，要实现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应当在政治民主化、政治法制化、政治科学化、政治公开化、政治高效化、政治清廉化和政治文化世俗化等方面不懈努力。笔者以为，政治公开化的位置应提升第一位，，因为马克思曾指出：“新闻出版是人类自由的实现。”希尔斯曼则说，“不管民主的定义是什么，没有新闻自由，民主本身就无法存在。”政治文明也罢，小康社会也罢，首先都应当是波普所说的“开放的社会”。封闭的社会或者僵化的社会，既无文明开化可言，也很难长期保持健康稳定的经济发展。

人们需要新闻自由，是因为他们需要道德的生活、政治的生活、科学的生活、趣味的生活。

但是中宣部的所作所为却是令人费解的，他们一边宣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一边又实行列宁也斥责的“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甚至还不如马克思指为“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的手检查出版物。马克思主义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主张新闻出版自由、反对书报检查制度。中宣部的“马克思主义”却没有任何诠释，好像是固执己见的一根筋，一根筋后来又变成了一条鞭，用它来驱策新闻出版界，似乎他们所做得一切，都是马克思所设定的，所造成的结果自然也应由马克思来负责。这不是诚实的政治家应取得态度。

所以，既然谈到马克思主义，就要正本清源，不能用一根筋或是一条鞭来代替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著作浩如烟海，而关于新闻自由的论述却相当集中，主要文章都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在马克思时代，只有政府机关报、教派机关报，马克思把它们统统归于“行业出版物”，一种“特殊形式的广告小报”，“把广告变成社论，把社论变成广告”，都属于“政治投机生意范围内的广告”。恰恰是这些“行业出版物”，却享有超出其他出版物的特权，因此马克思提出“自由出版物”主张来与其相对抗。中宣部诸公对此视而不见，在此不揣冒昧，分类摘编，冠以“自由出版物的四项出版原则”，以供“牢牢把握舆论宣传导向”者参考。

第一，人本原则。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因为只有人生来就有自己的利益与目标。有利益就要表达，表达了才有实现的可能。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报刊=自由报刊=人民报刊，它们极其忠实地报道人民的呼声，“不通过任何官僚中介，原原本本地把人民的贫困状况反应到御座之前。”这是实现民主化之前自由的新闻媒体所能发挥的政治作用。在民主社会中，自由的新闻媒介更能成为各社会阶层和政治团体表达意愿、整合意见和凝聚力量的主要载体，相对而言，新闻自由对社会底层阶级更为重要，有钱人希望通过钱的润滑作用在私底下悄悄运作，没钱的人则更依靠公开的声音和众人的舆论来表达自己的希冀。所以，马克思说过，“自由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

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出版物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认识又是聪明的首要条件。它是国家精神，这种精神家家户户都只消付出比用煤汽灯还少的花费就可以取得。它无所不及，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它是从真正的现实中不断涌出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财富汹涌澎湃地流回现实去的思想世界。”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出版物是历史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公开的表露。“如同生活本身一样，在报刊上永远不会有终结的东西。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中倾听来的东西，公开的报道出来；它尖锐地、激情地、片面地（像当年激动的感情和思想所要求的那样）对这些东西作出自己的判断。今天它所报道的事实或所发表的见解中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就会推翻。它体现出那种本来意义上的‘独特’的方针。”如果人民看不到反映自己的思想、恐惧和希望的东西，“它就会认为报刊是某种无关重要的和不值一看的东西，因为人民不让自己受骗。”只有在人民报刊的各个分子都有可能毫无阻碍、独立自主地各向一面发展并各成一行的条件下，真正“好的”人民报刊、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才能形成。马克思用一个比喻说明这种实践过程：“人要学会走路，也得学会摔跤，而且只有学会摔跤，他才能学会走路。”党性和人民性的本质区别在于，按照党性原则，报刊是党和人民联系的纽带；人民性是人民和世界联系的纽带，党性把人民从主语办成谓语，本质就发生了变化，它意味着人民已丧失了主体性，成为被强制灌输的对象，他们被摒弃在世界之外，只能接受来自上面的教育，只能按等级获得信息，甚至有关自身的信息，一经被装进档案袋，自己将永

远一无所知。党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人民连知情权都被剥夺的情况下，他们的命运就完全操纵在不可知的力量手中。马克思说，寡头政治一旦侵入精神生活领域，特权得势，就要压制人民的呼声，“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它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凡是违背你们信念的东西一开始便成为谬误，那么你们的要求和伊斯兰教徒以及其他的一切教徒的要求又有什么两样呢？”那时，“出版物已不是使人民联系起来的普遍纽带，实际上将成为分离人民的手段。”

第二，真实原则

正面的新闻报道可以鼓舞人、感染人、教育人，使人更加热爱生活、热爱事业、热爱祖国、热爱人类。不过，道德熏陶需要潜移默化、细水长流、持之以恒，发掘和褒扬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揭露和抨击人性中丑陋的一面，扶正压邪、扬善抑恶。但是，以往的“正面宣传”却承担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改造人性，塑造“新人”。为此，就要靠谎言来包装“正面人物”，让他们来说“高大全”（实际上是“假大空”）的语言，做一些违背常情、不可理喻的事情。新闻媒体在权力的胁迫下说假话已成为常规，偶然说了几句真话反会让人生疑，这是当前社会道德沦丧、诚信缺失的一个重要根源。虚伪的世界，令人感到压抑和沮丧，让伦理道德失去了栖息地，不撒谎，说实话，是一切

道德生活的基础。没有新闻自由，人们对有尊严、有道德的生活的渴求就无法实现。没有公民“荣誉感”的社会，即使人均GPT再高，也与“小康”无缘。

马克思曾经问道：“究竟什么样的报刊（‘好的’或‘坏的’）才是真正的报刊？”他给出的好坏与答案是：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谁在表达社会舆论，谁在歪曲社会舆论。在一个“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的国家”，“关闭的门完全不像透明的玻璃”，人民“只是凭道听途说才知道自己的国家的”，就不免要发生“事实上的撒谎”事情。但这应归于国家“不是公众的国家组织”，而是一个压迫公众的内部制度。它是国家的毛病、不是报刊的毛病。马克思认为限定“对政府措施所发表的见解，其倾向必须是善良的，而不是敌对的和恶意的”，或以“居心叵测的流言蜚语”为藉口，禁止发表“因热情、尖锐和傲慢而带有有害倾向”的作品，是“最可怕的恐怖主义”，“反对倾向的法律，既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乃是恐怖主义的法律”，结果是，“报刊不仅被剥夺了对任何官员进行监督的可能性，而且被剥夺了对各种制度进行监督的可能性。”马克思说：“刚刚具有政治觉悟的人民对某一事件的事实可靠性不像对这事件的道德实质（事件通过道德实质来表现自己的行动）那样关心。”这是事实或是杜撰，往往不那么重要。人民关心的是自己的意愿是否得到真实的叙述。这当然不是说“撒谎是报刊的必然的因素。”人民报刊有一种自我完善的能力，可以克服本身所带来的缺点。马克思以自己的生活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他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曾发表了驻摩塞尔记者彼?科布伦茨关于摩塞尔河沿河两岸居民生活的报道，莱茵省总督冯?沙

培尔指责文章“歪曲事实，诽谤政府”，还咒骂当地农民求助的呼声是“无耻叫嚣”。彼?科布伦茨的反驳软弱无力，不能深刻阐述自己的观点，马克思乃收集有关材料，以记者的名义写出答辩，对普鲁士社会政治制度作出了尖锐地抨击。马克思说，“只要报刊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揭示出来。”《莱茵报》因这一事件被查封，该报的股东要求报纸缓和立场，换取政府的取消禁令，但马克思拒绝作出妥协，为抗议现行检查制度，宣布退出《莱茵报》编辑部。马克思说，他与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进行的这一场官方论战，“第一次推动我去研究经济问题”。可以说，如果没有自由报刊的话，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第三，自由原则。

“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在各自的出版物中表现自己的精神。”自由，是人民报刊不可缺少的生存条件，正如空气之于人体。没有自由，人民性、真实性也就无从谈起。切实保障新闻自由，有助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者及时发现问题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因而是科学研究自由、学术探讨自由的前提条件。操纵新闻、封锁新闻的危害，前有“大跃进”时期导致几千万人死于非命的大饥荒，晚近则有“非典”的案例。有人尖锐的指出：在“非典”危机的前期，政府有关部门的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的情况如此严重，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哪里去了？媒体为什么在长时间里保持沉默、甚至扮演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角色？一些媒体的很多社论和文章把要求公布真相的声音说成是“别有用心”、“居心不良”、“恶毒攻击”等等，不仅

没有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而且丧失了起码的职业良知和做人的良心，难道不值得媒体和新闻部门反省吗？政府部门行动迟缓、不公开信息甚至有意欺骗愚弄民众，愚弄国际舆论、公开撒谎、瞒报漏报等行为，引起的公民受害应该可以起诉政府宣传部门及其有关人员。十六大报告提出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政府能力建设问题、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都需要创造良好的有利于实现新闻自由的舆论宽松环境。决不能如马克思所说“官方的命令都是真理”，怎么指示你，你就怎么说；命令你说什么，你就写什么。马克思认为自由是人类精神“伟大的天赋特权”，出版物是个人表现其精神存在的最普遍的方法，也是自由人联合体相互教育的工具。自由是一种终极价值，对自由的侵犯，是最大的犯罪。“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种形式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只要某一种自由成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问题。只要自由的某一种形式受到排斥，也就是整个自由受到排斥，——自由的存在注定要成泡影。”

恩格斯曾一再使用“绝对的新闻自由”这个字眼。他在《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政党》中进而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工人永远不能争得自身解放；争取出版自由就是工人政党本身呼吸所需的空气。他指出，“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是一个政治、法律、社会意义上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哲学概念。在这里，“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由的意见”。但是，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制的自由，新闻自由也不例外，它要受到新闻真实性和公正性的限制。现代自由主义所谓的自由，都

是指“公正的自由”，而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自由出版物的死敌是书报检查制度，自由是通过反对书报检查制度争取来的。马克思出道的第一篇论文就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随后又写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辩论》，对议会发言中种种反对出版自由的论调都做了驳斥。并且指出，把检查法和出版法混为一谈是荒谬的。检查法只具有法律的形式，出版法才是真正的法律。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出版法也根本不能成为压制出版自由的手段，“在出版法中，自由是惩罚者，在检查法中，自由却是被惩罚者。检查法是对自由表示怀疑的法律。出版法却是自由对自己投的信任票。出版法惩罚的是滥用自由。检查法却把自由看成一种滥用而加以惩罚，它把自由当成罪犯。”“在法官面前受审的是出版物的一定过失，而在检查官面前受审的却是出版物的精神。法官最多可能表现出个人理性的不可靠，而检查官表现出的却是品行的不可靠。法官根据一定的法律来审理我的行动，检查官不仅惩罚罪行，而且他自己还捏造罪行。”“法律不仅惩罚我所做的，而且还要惩罚我所想的，不管我的行为如何。法律惩罚我不是因为我做了坏事，而是因为我没作坏事。”书报检查法的制定是以无原则和对国家的不道德而粗鲁的看法为基础的。有人为中宣部的阅评小组评功摆好。但问题不在于这个草台班子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而在于它的存在有没有法理依据，因为宪法和党章都没有赋予它现在拥有的这么大的权利。正如马克思所说：因为“它把反国家的东西却表现为国家的意见。”“任何国家都不敢把它利用书报检查官这一工具实际上所能干出的事情明确的规定在法律中。因此，专司书报检查的不是法庭而是警察机构。”检查官集原告、辩护人和法官三种身份于一身，“被委任去管理精神，然而他是不负重责的。”这就产

生了一个悖论：即检查本身也需要受检查。马克思问道，“除了人民的出版物还有谁能够检查政府得出版物呢？”结论是：“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

第四，公正原则

任何权利都会导致腐败，不受制约的权力则会导致绝对的腐败。既然新闻媒体是“国家中的第二种权利”，出现新闻腐败就是情理中的事情。根据恩格斯“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只能通过立法和司法程序来制约它，以保障新闻的真实性和公正性，而不能由行政长官来任意干预。正如马克思所说：“应当认为没有关于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自由领域中取消出版自由。因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因此出版就是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有人将自由与法制对立起来，视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新闻自由为洪水猛兽，迟迟不出台《新闻法》，认为《新闻法》会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保护伞，竟然还好意思吹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

对于新闻媒体的行政干预与司法审理是有本质区别的。行政干预往往是事前审查和禁止，司法审理则只能是事后追惩；行政干预通常是黑箱作业，司法审理则必须公开进行；行政审查的理由往往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司法惩处则必须依据法条并形成判例。现在有些地方的宣传部门进行行政干预时，连红头文件或首长批示都没有，只是通过电话或口头下达指令，可见他们是多么的心虚。但是，更重要也更经常使用的的方法应该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

首先不应该从外部施加任何压力，必须承认它具有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我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身的内在规律，这种规律不能也不应该由于专横暴戾而失掉。”“从出版自由本质所产生的真正的检查是批评。它是出版自由自身产生的一种审判。”另一方面，，“在报刊上治人者和治于人者同样可以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然而并不是在从属关系的范围内进行这种批评，而是作为——已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理智的力量，作为合理的观点的体现者——在权力平等的情况下进行这种批评。‘自由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的，它也制造这种舆论。唯有它才能化私人利益为普遍利益。”“检查制度是政府垄断了的批评。”而且，这种批评不是公开的而是秘密的，只想进行批评而不想受到批评，把粗暴蛮横当作论据有理，因而不合理的。有了压制真理的法律，就会激发真理更英勇地追求自己的目的。

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界乃至整个知识界的分歧，既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分歧，也是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分歧，但最根本的分歧则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今日的当权者都是文革中“继续革命”理论培育出来的红卫兵，当年的小将已经成为中将、老将了，他们念念不忘的就是一个“权”字，专政之权、镇压之权，“有了权利就有一切，失去权利就失去一切。”因此，在他们的思维中，提高执政能力不过是“加强专政能力”的另一种说法。他们的最大本领就是把一切不同意见当作敌对思想，而且还要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发号施令，剪除异己。我以为要辩明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是什么内容，最好的办法是将马克思有关言论自由的文章汇编成册，由读者去学习去领会，再由他们自己来作出判断，不要让马克思去做暴虐机关的挡箭牌和替

罪羊了。马克思的新闻观大部分反映在他担任《莱茵报》主编时写得评论中，列宁认为这些论文“表明了马克思怎样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可以说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特别是考虑到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把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反动势力作为批判对象，而这正是我们思想启蒙运动尚未完成的任务，这些论文对我们今天该具有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不知道中宣部有没有勇气编一本诸如《马克思论新闻自由》的册子？或许有人会说，在马克思谈论这些问题时，共产党还没有掌权，因此这些认识会有一些的历史局限性。不过，马克思早已声明过，这些原则不是为执政党也不是为在野党提出来的，而是根据“报刊自己的内在规律”提出来的。马克思终生都没有改变过自己关于人民报刊的立场。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也说过，“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马克思最值得学习的地方，也许还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他观察、分析问题的思想方法和批判精神。教人沉默易，令人开口难。我们期待着中宣部对马克思提出的原则作出正面回应，在新闻出版界开展一场大辩论，澄清思想，辨明方向，进而把宣传工作纳入正确地渠道。